

## 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词条选译（二）\*

“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

项目组 译

### 澳大利亚诸语言（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В.И. Беликов；译者：林春泽，黑龙江大学）

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不包括巴布亚的米里安语（托雷斯海峡东部岛屿）和**塔斯马尼亚诸语言**。澳大利亚诸语言谱系相近的关系尚未证实。欧洲移民开始前的澳大利亚人共有30万左右，操260多种语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原住民的数量持续减少，到20世纪后半叶他们的数量约为16万人（包括混血人口），其中能够掌握澳大利亚语言的人不超过半数。200余种澳大利亚语言中的很大一部分濒临消亡。使用所谓“西部沙漠语”的仅4千人，操其他语言的人数从几个人到数百人不等。许多澳大利亚语方言众多，由于词汇分歧严重，其中一些方言的使用者互相之间不能沟通。这造成区分语言与方言的困难，以至有时把**澳大利亚诸语言**的总数估计为500到600种不等。

**澳大利亚诸语言**包括12个独立的语言：阿宁迪利阿瓜（Anindilyakwa）、瓦赖语、古纳维吉语、卡卡杜语、昆加拉卡尼语、曼加赖语、门金语、纳卡拉语、恩格温语、农古布尤语、蒂维语、雅纽拉语和16个语系（括号里为语系中的语言数量）：布纳巴语系（2）、布雷拉语系（2）、沃罗拉语系（3）、加拉马语系（2）、贡温古语系（11）、戴利语系（12）、杰拉格语系（5）、金吉利-瓦姆巴亚语系（3）、贾明琼语系（4）、伊瓦贾语系、卡拉瓦语系（2）、拉拉基亚语系（2）、曼格里语系（2）、马拉语系（3）、纽尔纽尔语系（4）和帕马-尼翁加语系（约180）。数量最多的帕马-尼翁加语系（25个语族和180种语言）覆盖了澳大利亚大陆7/8的领土（不包括丹皮尔地和澳大利亚西北部的金伯利高原、阿纳姆地的大部分地区和卡奔塔利亚湾西南沿岸及邻近地区）。

大部分澳大利亚语言除词汇方面有些区别外，在语言结构的所有层面都存在类型学、实际构建方面的相近性。通常情况下，澳大利亚诸语言中不存在擦音，没有清音和浊音的对立；爆破音和鼻音系统各有6个（双唇音、齿音、舌尖音、卷舌音、腭音、软腭音）；有4个边音，1个颤音和3个滑音（双唇音、卷舌音、腭音）。许多澳大利亚语言（澳大利亚中部、南部和昆士兰州西南部的语言）的爆破音系列的数量增至4种（强音、弱音、鼻化音、边音）；在阿纳姆地的某些语言中存在挤喉音。在个别语言中，爆破音和鼻音音位的数量由于齿音的缘故而减少，也有不多因腭化音的缘故而减少的情况。约克角半岛诸语言中（帕马-尼翁加语系）没有卷舌音，但有擦音。澳大利亚诸语言中通常只有3个元音音位i, a, u，但约克角半岛某些语言的元音系统却以种类繁多为特点。大部分澳大利亚语言的音节结构是CV(C)，很少有辅音组合。重音通常位于第一个音节上。

所有的澳大利亚语言都属于黏着语，帕马-尼翁加、金吉利-瓦姆巴亚和卡拉瓦等语系

\* 本栏目刊登的选译词条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由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担，译者和审校者均为项目组成员。

的语言中以及门金语中只有后缀，其他的语言既有后缀，也有前缀。在一系列语言中，主、宾语标记不是依附于谓语，而是依附于特殊的助词——“催化词”或者句中的第一个词，如 *ɲadjulu-lu ka-na-ŋgu nja-nji* ‘我看见你’，其中 *ka* 为作格催化词（帕马 - 尼翁加语系西南语族的瓦尔比里语）。动词通常区分出 2 - 3 个时间形式，某些语言必须准确指出一天中行为实施的具体时刻。人称代词也可以有时间范畴。名词的数通常不表示出来，人称代词有多达 4 种相互对立的数的形式。指示代词系统很复杂。非派生数词的数量不多，通常只有 3 - 4 个。澳大利亚人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语法范畴体系中有所反映。例如，在拉尔迪尔（帕马 - 尼翁加语系坦加语族）非单数人称代词具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用于指代对话人而言的偶数辈分人，另一种形式用于奇数辈人。如**排除式**（*экслюзив, exclusive*）双数第一人称分别使用 *njari* ‘我和他（兄弟、祖父、孙子等）’和 *nja:ni* ‘我和他（父亲、儿子、曾祖父等）’。

句子中的词序通常是自由的，但以 SOV 式为主。大多数澳大利亚语言都是作格语言，属于主格语言的只有帕马 - 尼翁加语系坦加语族（卡奔塔利亚湾）和恩加亚尔达语族（澳大利亚西部）诸语言。澳大利亚语言的大部分前缀（准确地说是前缀 - 后缀）语族和几个地域分散的后缀语族都具有若干一致关系的类别：*jaŋani-n dji:yi—li-n nawara-n maraŋi-n nare:ŋari n-amangi*（*n* 为类别标志）‘我看到的这位高大的男子是谁？’（杰拉格语系的吉贾语）。许多澳大利亚语言中都可能存在**嵌入**（*инкорпорация, incorporation*）的现象，经常通过异干形式实现，如 *ɲiri-puŋita-wuri-ni* ‘我割下了他的一只耳朵’；‘耳朵’一词的自由形式是 *turna*（蒂维语）。

澳大利亚诸语言的研究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从事澳大利亚诸语言研究的基本上是民族学家和传教士。当时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一概是词汇手册和简明的语法概要，后者的撰写常常以拉丁语语法为出发点。第二个时期是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这一时期与 A. 凯佩尔及其学生的研究活动相关联，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语法描写成果。澳大利亚诸语言第三时期的研究始于 1961 年创建澳大利亚原住民研究所，该研究所协调民族学和语言学的全部研究工作；许多澳大利亚语言的详尽语法著作相继问世，词典编纂工作积极开展，澳大利亚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也开始进行。

关于刊登澳大利亚诸语言资料的杂志参见**南岛诸语言**词条；《澳大利亚语言学杂志》（圣卢西亚，1981 - ）的大部分篇幅也都以澳大利亚诸语言为内容。

Capell A., A new approach to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ydney, 1956; 2 ed., Sydney, 1962.

Ego же, History of research in Australian and Tasmanian languages,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 8, pt 1, The Hague — P., 1971.

O'Grady G. N., Lexicographic research in aboriginal Australia, там же.

Greenway J., Bibliography of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and the native people peoples of Torres Strait to 1959, Sydney, 1963.

Wurm S. A., Languages of Australia and Tasmania, The Hague — P., 1972.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Atlantic Highlands (N. J.), 1976.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tudies, Canberra, 1979;

«Handbook of Australian languages», v. 1—3, Canberra, 1979—83.

Dixon R. M. W., The languages of Australia, Camb. — [a. o.] 1980.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 阿尔泰诸语言（Алтай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И. В. Кормушин；译者：许宏，上海外国语大学）

表示一个超语系的约定性术语，该超语系以推测的发生学同源性为根据，将**突厥诸语言**、**蒙古诸语言**、**满 - 通古斯诸语言**，以及孤立的**朝鲜语**和**日语**统合在一起。当初（19 世纪 30 年代）阿尔泰诸语言中还包括后来被改称**乌拉尔诸语言**的那些语言。术语“阿尔泰（诸语言）”指出了诸语言可能的最早起源地。

G. 兰司铁、N. N. 鲍培（又译波普）、Е. Д. 波利瓦诺夫、W. 科特维奇、M. 拉塞农等人的著作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科学立场出发提出了阿尔泰语系假说，假说产生的根据是：在列举的诸语系中（朝鲜语和日语仅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才被纳入阿尔泰学的建构中）存在大量

的共同词汇；语音系统、词的语音和形态结构（**元音和谐和黏着**）一致；大多数派生范畴和关系范畴以及句法结构在构造和内容上具有同类性或同一性，而且许多词缀语素被认定在物质上是相同的。

在类似的这些对比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语音对应关系：词首 p-（p- / f- / h- / 零——译者注）的发生学对应关系，或者所谓的兰司铁 - 伯希和定律、词首 j- / n-，j- / d- 的对应关系、r 音化（*ротацизм, rhotacizm*）、l 音化（以 l 代替 š，*ламбдаизм, lambdacism*）、词根中 -a / -i 的元音交替等。但是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在对资料全面考察后发现，在基本词汇类别中，如在数词，人体部位、季节和昼夜时段、天体、天气现象等的名称中，对应的比例度如此之低，以至根据词汇统计理论（参见**语言统计学**），原始阿尔泰语的存在超出了可以接受的年代界限。许多早先确定的词汇和形态平行关系在语音和语义上的理据遭到了质疑，一些语音对应被认定是臆想的，例如 r 音化（突厥共同语的 -z 相应于楚瓦什语中的 -r、蒙古诸语及满 - 通古斯诸语中的 -r），这是因为与 r 相关的对应词在蒙古诸语中被认为是来自突厥语系原始布尔加尔语方言的极古老借词，在满 - 通古斯诸语中被认为是随后来自蒙古诸语的借词。由此对不仅在语音方面，而且在形态方面可能的相似和明显的差异给予了各种不同的评价。

阿尔泰诸语中名词的语法范畴——格、领属和数——既有共同的结构和形式特点，又有显然不同的特征，如主格作为主语的格标记为零，但是在古蒙古语中有用间接格表示的情况，蒙古诸语和满 - 通古斯诸语中词干末尾的 -n 在大部分情况下脱落了，在间接格中被恢复。突厥诸语中有统一的属格构形成分（-iŋ），蒙古诸语中却存在若干变体（-nu, -un, -jin），而在满 - 通古斯诸语中，其使用仅局限于索伦语和满语（-ni, -i）。这些形式的辅音（ŋ / n）和元音（i / u）区别无法严格地解释，位格的形式也是如此——在突厥诸语中是 -ta / -da，蒙古诸语中是 -da / -ta 和 -du / -tu，后者通常与满 - 通古斯诸语中的与 - 位格 -du / tu（通古斯诸语）、-da / -ta（满语）接近，因为蒙古语的标记包含了与格的意义。蒙古语以 -a 结尾的古旧与格和突厥语 -a 结尾的与格相同（虽然突厥诸语中的这个 -a 与克普恰克语族中的与格 -ya / -qa 之间的相互关系尚不明确），但是在满 - 通古斯诸语中没有找到平行结构。宾格（*винительный падеж, objective accusative*）的情况也类似：突厥语是 -i（与古突厥语宾格（*accusative*）-iŋ 的关系存在争议），蒙古语是 -i / -ji，而满 - 通古斯语的宾格形式却是完全不同的 -ba / -wa。通古斯诸语言中位格的部分形式通过标记的复合方式构成，但在聚合体中这些标记也作为独立的形式保留着。格词缀的复合也是蒙古诸语言的特点，但这在突厥诸语言中却不存在。通古斯语的格体系中有以 -ja 结尾的不定宾格，表示事物用途、目的客体和部分量（*партиципальность, partitive*）语义，在突厥诸语和蒙古诸语中找不到类似现象。

部分的一致关系还可见于名词领属范畴聚合体、领属范畴意义表达方式以及语法复数使用等方面。例如，在阿尔泰诸语所有语族中，语法复数都能表示集合多数或代表多数、分配多数、巨大空间多数等陈旧意义，即实质上的派生性质义。由此可见，认为原始语状态时曾存在大量初始标记（-t / -d, -s / -z, -r, -l, -k / -q, -m 等）的假说是合理的，这些初始标记通过对一小类词的词源学分析得到了证实，这类词的词干组成缩简了这些词缀；正是这些词缀历史地形成了能产的复数词缀，比如，共同突厥语的 -lar 和楚瓦什语的 -sem，满 - 通古斯语的 -sal，这些词缀发展了分配多数的抽象意义。

和名词一样，突厥诸语、蒙古诸语和满 - 通古斯诸语动词的各种具体范畴结构在许多方面相近或相同（如时间范畴的演化等），同时可以发现，这些范畴的物质表达手段也是一致的（如以 -r / -ra 结尾的现在 - 将来时），但是尽管如此，动词范畴在语义和外形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当初多半表示结果意义的过去时是在行为过程名词的不同标记（且每个语族都不同）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不排除突厥语以 -di 结尾的简单过去时和蒙古语以 -ši 结尾的完成时的同源性）。态的方面尽管总体上结构相近，但被动态、交互态和共同态的标记不同，而使动态的构形成分中表现出一些相同之处；在满 - 通古斯诸语和蒙古诸语中没有突厥

诸语中的反身态,这可能与名词在满-通古斯诸语和蒙古诸语中有反身领属范畴而在突厥诸语中却没有相关联。

在用词缀法表示动词行为方式这一词汇-语法范畴方面,重构了具有强化、多次和节奏意义的构形成分\* -ga, \* -la, \* -r, \* -k, \* -ča; 具有行为开始、进行、结束和时空分配意义的词缀在满-通古斯诸语中有体现,但在突厥诸语和蒙古诸语中却几乎没有体现。突厥诸语和蒙古诸语在这种场合使用的是语义相同,而物质面貌各异的动词-修饰语。

在否定领域,尽管各类标记的物质同一是完全可能的,但它们的结构-范畴地位彼此并不相同,这可以用历史变换来加以解释:共同成分\*e(语气词或动词)在满-通古斯诸语的动词否定分析结构里,出现在否定动词e-的所有聚合体形式中,在蒙古诸语里,出现在形态繁化的动词否定语气词ese中,在突厥诸语里,只有楚瓦什语语气词an < \*en有从属于动词的否定性质,其它突厥诸语的语气词aba, aŋ, anna, ap与名词连用表示否定,满-通古斯诸语言中的ana, aba, aqu和蒙古诸语言中的buu > \*abuu也是如此。但尚不清楚,导致a < \*e的原因是否由于形态上增生的软腭元音影响,或者这是另外的一个词根成分。

形动词、副动词、时和式是一些原本统一,而后在历史上发生分化(功能专门化)的形式(范畴),阿尔泰诸语的所有语族在这些形式(范畴)的最初(简单)标记当中至少可以发现两类相似的标记:带有构形成分-m/ -mi的(突厥诸语以- mi结尾的行为名词中和以miš结尾的形动词组成中;蒙古诸语以-nam和 -mui结尾的现在时形式组成中;满-通古斯诸语以-mi/ -ma-ri结尾的副动词中)和带有构形成分-p ~ -b/ -pa ~ -ba的(以-p结尾和以-pa-n ~ ba-n结尾的突厥诸语副动词中;以-bai结尾的蒙古诸语过去时中;以-pi/ -pa-ri结尾的满-通古斯诸语的副动词中)。

由于没有足够完整的原始语重构体系来解释阿尔泰诸语各语族在所有结构和物质上的差异,其亲缘关系的假说无法认为是已得到证实的,但由于已提出的大量对比的可能正确性,该假说也不能认为是毫无根据的。为了正确地纳入朝鲜语和日语,需要用历史比较法进行特别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因为不仅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而且在语音方面这两种语言中的假设相同点都有着非常多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阿尔泰学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领域,其任务就是要系统、深入、严格地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方法和最新方法。

Рамstedт Г. И., Введение в алта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орфология, М., 1957.

Котвич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алтайским языкам, М., 1962.

Проблема общности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Л., 1971.

Очер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Л., 1972.

Очер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морфологии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Л., 1978.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этимологии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Л., 1979.

Баскаков Н. А., Алтайская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и её изучение, М., 1981.

Алтайские этимологии, Л., 1984.

Кормушин И. В., Системы времён глагола в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ах, М., 1984.

Ramstedt G. J.,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Hels., 1957.

Poppe N.,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 t. 1, Wiesbaden, 1960.

Его же,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Wiesbaden, 1965.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 字母表 (Алфавит)

(作者: В. В. 伊万诺夫; 译者: 王松亭,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通过描写各别语音成分的若干象征符号来表示语言单词语音面貌的书面符号体系。字母表的发明使人们可以书写自然语言的任何文本,而不必诉求其意义(有别于使用概念的书面符号——表意符号和单词的书面符号——表词符号的文字体系不同),从而使任何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各种文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固定、保存和传播,促进了文化知识和欧洲文明其他成果的普及。所有已知的字母表的特点是,它们都有表示单词中音位的若干组合规则和一套聚合符号,这些符号的所有使用者都了解它们有严格确定的排列顺序。在所有存储和查询

信息的现代手段（如词典、供查询的其他出版物、目录等）中，这种按字母表排列的原则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字母表原则是由西闪米特人发明的。公元前 3000 年中叶，埃勃拉城（位于现今叙利亚北部的特尔·马尔蒂赫）的西闪米特（古迦南）文牍人员使用从美索不达米亚引入的楔形文字书写当地的埃勃拉语和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语，他们将楔形文字的音节符号进行了分类，把带同一辅音的音节符号按元音性质加以排列：**ma, mi, mu**（闪米特诸语言只有三个元音 **a, i, u**）。从迦南文牍人员书写的埃及阿马尔纳档案（公元前 14 世纪）得知，后来的**楔形文字**音节符号系统沿袭了这个原则。看来，西闪米特人是在不迟于公元前第二千年的前半叶，通过借鉴楔形文字和埃及文字（像楔形文字一样，埃及文字也是逐渐从混合型的词符 - 音节文字演变为音节文字）的经验，创立了这种初始类型的辅音音节文字，其中的符号表示辅音（如辅音 **w**）与任一元音组合的音节（如 **wa, wi, wu** 之类音节，不像楔形文字那样用不同符号书写，而是用一个符号书写）。促成这项发明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当时间跨越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与第二个千年的交界之后，在使用楔形文字书写几种不同语言（赫梯语、胡里特语和古安纳托利亚语）的叙利亚、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原先读 **wa** 的同一个楔形文字符号可以用来表示同一开头辅音与不同元音（**a, i, u, e**）组成的不同音节，这些元音符号都可以写在该辅音标记之下。换言之，表示音节内音位的字母表原则已经在这个楔形文字地域变体的某些场合采用了。看来，西闪米特人在创造自己的文字之前已经知道这种变体，他们的文字或许就是在楔形文字这种地域变体的基础上创造的。因为闪米特诸语言的元音性质取决于单词的语法类型，所以西闪米特语辅音 - 音节文字里的元音通常不表示出来，虽然在总的符号集中有表示元音的特殊符号，以用来比如拼写外来词，此时的元音无法根据形态规则从辅音组合式单词的总体面貌中推导出来。在闪米特诸语言的文字（以及许多发端于此的文字）中，表示母语单词时基本上不采用字母（字母表）原则，而采用音节原则，仅通过标出辅音来拼写单词。在文字符号总汇中加入元音符号之后，作为音位书写标记有序集合的字母表才最终形成。由此可见，字母表符号聚合集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于每个音位用字母表单个符号表示的组合原则的最终确立。后者与音节或辅音 - 音节原则的竞争时间是相当漫长的（试比较：现代计算机语言中诸如以符号 **B** 表示整个音节 **Bə** 的许多字母缩略词，这体现了辅音 - 音节原则的变体回归）。

作为一个聚合系统的字母表，城邦国家乌加里特的字母表是最古老的，自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叶已为人所知，这个字母表用来按辅音 - 音节原则书写乌加里特语（参见：**乌加里特文字**）和胡里特语。字母表包括 30 个符号，其中倒数第 2, 3 两个符号是用于表示元音的附加符号。乌加里特字母表的符号顺序是严格确定的（从乌加里特档案室里）发现的若干块绘有字母表的泥板中得知），与公元前第二千年最后几个世纪开始闻名的其他几种西闪米特字母表的顺序基本相符，如腓尼基字母表（参见：**腓尼基文字**）、古犹太字母表和其他一些字母表。由于西闪米特诸语言语音的发展变化，部分古音位之间失去差别，其中一些因而消失，所以乌加里特语字母表以及与其有亲属关系的其他字母表的符号数量有所减少。尽管乌加里特语符号的笔画取决于书写材料（泥板）和书写工具，但仍然可以确定，大多数符号同与之相应的其他西闪米特语言字母表有共同的来源，后者由于书写在另外的材料（岩石、金属）上，使用另外的书写工具，因而成为同一套符号的变体形式。乌加里特语字母表的符号形式一部分无疑（而大多数则可能）来源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叶的叙利亚 - 小亚细亚 - 北美索不达米亚变体楔形文字一些音节符号的简写形式。所以，西闪米特字母表符号的共同初始原型可能就产生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叶，是该变体楔形文字某些符号形态变异的结果，另外可能添加了少许新创造的符号。看来，所有西闪米特语的早期文字体系都有在必要时还表示元音的可能（像乌加里特语一样），仅早期乌加里特基本符号集中有专门表示元音的特殊符号收入，而其他的一些字母表（包括那些虽有这种符号，但数量极少的字母表）还要采取另

外的一些手段来表示元音。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和第一个千年之交（也可能稍早一些），由 22 个字母组成的腓尼基字母表为希腊人所引进（参见**希腊文字**）。希腊人将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使古希腊语字母表得以最终成形：字母表纳入了元音符号，这些符号在表中占有确定位置，不仅用在字母表成分的聚合清单里，而且还出现在所有的具体组合用法中（与乌加里特语不同）。字母表字母和音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了互逆的一一对应关系：所有字母表的符号都用来书写与其对应的那个音位，每个音位也与特定一个字母相应。具有同样这些特点的是与古希腊语有近亲关系的埃特鲁斯语字母表（可能是埃特鲁斯人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从小亚细亚由海上移居意大利时带入的）以及古希腊罗马时期小亚细亚的**小亚细亚诸语言字母表**（吕底亚、利基亚、弗里吉亚等语的字母表），它们与埃特鲁斯语字母表有共同的特点。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古代，西闪米特字母表是通过小亚细亚（那里居住着部分说希腊语方言的居民）传播开来的，不过，更可能的是，完全或大部分情况下以希腊语为中介，虽然也有假设认为，小亚细亚文字传统的借入（如先借入弗里吉亚文字传统，晚些时候再从那里传到埃特鲁斯文字传统）与希腊传统无关（有一种假说甚至认为，希腊语字母表从小亚细亚诸语言的一种字母表或诸种字母表发展而来）。总之，所有上述字母表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和第一个千年之交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至今仍存在争议。后来，希腊语字母表成为大多数古代字母系统建立的基础（模式），包括拉丁语字母表和其他古意大利语字母表（受埃特鲁斯语的影响）、亚美尼亚语字母表、格鲁吉亚语字母表、哥特语字母表、古斯拉夫语字母表等等。这些字母表的符号顺序、名称、形式等与希腊字母表丝毫不差或有某些变化。字母表为书写新的语言而进一步的传播是在已经建立的众多字母表基础上进行的，其中首推拉丁语字母表（参见**拉丁文字**）、西里尔字母等。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及较晚的时期，起源于西闪米特字母表的一些辅音 - 音节文字体系也（在包括中亚和印度的地方）发展起来，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的一些南阿拉米语字母表已被证明是西闪米特诸语系统的早期分支。

在所有已知的字母表系统中，每一个字母均有自己的名称。字母的名称在具有亲属关系的体系中（如在闪米特诸语中，乌加里特语字母的名称与同原型的南阿拉米语字母相似），当字母从一个体系借用到另一个体系时（如从西闪米特语体系借用到希腊语体系），都基本保留下来。但在除乌加里特语传统（明显是为了便于记忆和教学）外的许多西闪米特传统里，字母名称都是由表示事物的词（由相应音位开头的，如 *aleph* ‘公牛’、*beth* ‘房子’等）构成的。这大概是导致一种错误理论产生的原因，按照这个理论，相应的字母来源于描绘这样或那样物体的图案。用这种字母象形称名法（用图案的描绘词称名词首字母）来解释字母来源并不符合文字发展历史的实际情况。倘若如此，也同样可以成功地认为俄语里的 *a*（圆形行书）来自于西瓜（*арбуз*）形象（在一些儿童识字课本中，西瓜图片经常和字母 *a* 一并出现）。

已知的最古老的一些字母表，包括乌加里特字母表在内，它们的符号都不用来表示数。在乌加里特语文本中，表示数用一些特别的象征符号，这些符号一部分借自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这个传统在一些小亚细亚文字和埃特鲁斯语、拉丁语文字中延续下来，这些文字中还保留了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减法记数原则：如罗马数字 *IX* = ‘10 - 1’。后来，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的西闪米特语字母表以及希腊语字母表中，固定的字母序位本身被用来表示数：序位第一的字母（如希腊字母表的阿尔法）可充当自然数列第一整数的符号（ $\alpha$  = ‘1’），序位第二的字母充当第二整数符号（ $\beta$  = ‘2’）。这一原则保留在以希腊字母表模式为基础的许多体系中，包括古斯拉夫语和古俄语体系。即使字母的形式发生变化，该字母在字母表中的序位及其数意义大都仍然保留，所以，对于研究字母表历史而言，表示数的手段

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多数现代民族语的文字体系均以字母表为基础：拉丁语字母表、斯拉夫西里尔字母表（参见**西里尔字母表**，**俄语字母表**）、阿拉伯语字母表（参见**阿拉伯文字**）和印度诸音节字母表（参见**印度文字**）。

作为语词、文本构造成素的聚合集，字母表的概念可用来描写人工逻辑语言和数理语言，包括数学、数理逻辑和符号学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字母表成素与任何音位、任何特定数通常都不对应，但字母表的每个成素都应有自己的自然语言名称（以作为描写该人工语言的元语言）。

Дирингер Д., Алфавит,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63.

Гельб 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иллабарии, пер. с англ., в кн.: Тайны древних письмен, М., 1976.

Его же, Опыт изучения письма. (Основы грамматики),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82.

Лундин А. Г.,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алфавита,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2, № 2.

Гамкрелидзе Г. 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типология алфавитной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а,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8, № 5, 6.

Cohen M., 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 P., 1958.

Humez A., Humez N., Alpha to omega: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ek alphabet, Boston, 1981.

Naveh J., Early history of the alphabet: an introduction to West Semitic epigraphy and palaeography, Jerusalem — Leiden, 198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 阿拉米诸语言（Арамей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А. А. Папазян；译者：陈勇，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闪米特诸语言的一个语支。И. М. 季亚科诺夫将阿拉米诸语言定义为尚处于中间状态的闪米特诸语言中北部语支的一个分支。

大马士革、哈马、阿尔帕德、沙玛尔和亚述出土的古阿拉米铭文（公元前 9 - 7 世纪）以及阿契美尼德文书使用的古典阿拉米语（或称“帝国”阿拉米语）（公元前 6 - 4 世纪）是阿拉米语的最古老时期，后者的一个变体是圣经阿拉米语（圣经旧约中的个别词、句和章节，公元前 5 - 2 世纪）。较晚时间的阿拉米诸语言分为西部方言群（接近于古阿拉米语）和东部方言群。西部方言群包括：纳巴泰语（公元前 1 世纪 - 公元 2 世纪）；帕尔米拉语（公元前 1 世纪 - 公元 3 世纪，这两种语言有时均被归入古阿拉米语）；犹太 - 巴勒斯坦语（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 - 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含两种变体：一种为库姆兰《创世纪基督教伪经》（公元前 1 世纪）、翁克勒的塔古姆（摩西五经的阿拉米语译本，亦称《巴比伦塔古姆》）和约拿单的塔古姆（先知书的阿拉米语译本）所用的语言，另一种为加利利方言，主要是一些米德拉西（圣经旧约各卷的解说）和耶路撒冷塔木德（犹太教口传律法汇编——译者注）中的阿拉米语部分；撒马利亚语（公元 4 世纪《撒马利亚塔古姆》以及其他更晚的文献资料）；使用叙利亚语文字的梅尔基特人的基督教 - 巴勒斯坦方言[旧约片段、圣餐仪式祷文（公元 5 - 7 世纪）]；大马士革附近的巴哈、朱巴丁和马卢拉等居民点使用的现代方言。东部方言群包括：从埃德萨地区到伊朗通行的叙利亚语，5 世纪时分成西叙利亚方言（雅各方言）和东叙利亚方言（聂斯托利方言）（公元 1 世纪的铭文、公元 3 - 14 世纪丰富的基督教神学文献）（最古老的字体是埃斯特朗格拉（estrangela），由其发展出了雅各（“谢尔托” sereto）字体和聂斯托利字体，参见**西闪米特文字**）；从 8 世纪开始，叙利亚语渐渐被**阿拉伯语**代替；巴比伦 - 阿拉米语（大约 4 - 6 世纪的巴比伦塔木德以及始于 5 - 6 世纪的其他一些魔法文本）；曼达语——诺斯替教曼达派成员（在祈祷书籍里）使用的方言（始于 3 世纪）——使用古阿拉米文字的一种特殊变体，一些字母有规律地表示元音（现代曼达土语被生活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少数教派代表人物保存了下来，主要供祭祀需要，与阿拉伯语一起使用）；现代的所谓**亚述语**（新叙利亚语）。

阿拉米诸语言失去共同闪米特语辅音组成中的  $\acute{s}$  (> $\gamma$ ) 和  $\acute{g}$  (> $h$ )。非强势爆破音  $b$ ,  $p$ ,  $d$ ,  $t$ ,  $g$ ,  $k$  的语音变化过程在中世纪初已经完成，在元音之后的位置上规律性地变成擦音；在新阿拉米语土语中，这些辅音的擦音化变体已成为独立音位。在远古时期，可能曾保留过齿间音  $\acute{t}$ ,  $\acute{d}$ ,  $\acute{t}$ ，但到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叶发生了以下变化： $\acute{t}$ > $t$ ,  $\acute{d}$ > $d$ ,  $\acute{t}$ > $t$ ;  $\acute{d}$ > $^{\leftarrow}$  或  $q$ ;  $\acute{s}$ > $s$ ,  $h$ > $h$ ;  $g$ > $^{\leftarrow}$ 。西部阿拉米诸语言中，' $>$ '， $h$ > $h$  类的弱化比较频繁，这直接导致 ' $>$ '  $\emptyset$ ,  $h$ > $^{\leftarrow}$   $\emptyset$ 。

新阿拉米语的方言中出现了新的辅音：齿龈塞擦音  $\text{ğ}$  和  $\text{č}$  (<t)、齿龈擦音  $\text{ž}$ 。对于早期和中期的元音，主要只能根据从 6 世纪开始有元音符 (огласовка) 的圣经 - 阿拉米语和叙利亚语文献进行判断。东叙利亚语方言保留了较古老的元音系统，而在西叙利亚语方言中则出现  $\bar{a}>\bar{o}$ ,  $\bar{o}>\bar{u}$ ,  $o>u$ ,  $\bar{e}>\bar{i}$  这样一些变化 (在某些类别的词中)。阿拉米诸语言中的重音基本上是落在最后一个音节，由于尾音位的非重读元音脱落并且重音移至词尾，因而最后一个音节成为闭音节、长音节；重音节前第一开音节中的短元音弱化为中、央元音 (参见喉音理论 (ларингальная теория)) 或者脱落；在非重读闭音节中，短元音  $a$ ,  $i$  变成  $e$ , 短重读元音  $u$  变成  $o$ ；词尾开音节中  $\bar{i}$  变成  $\bar{e}$ 。到 7 世纪末，词尾的开音节开始失去重音。

阿拉米诸语言的名词 (包括形容词) 有两种语法性 (阳性和阴性)、两种数 (单数和复数)；双数的痕迹只存留于数词和表示身体成对部位的名称中)、3 种状态：绝对 (一般) 状态 (*status absolutus*, 共同闪米特语中的 *status rectus*)、结构 (伴随) 状态 (*status constructus*)、强调 (有定) 状态 (*status emphaticus*)。在新阿拉米语方言中，状态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表示有定状态的标记后缀冠词 -a 渐渐失去定指功能，而变成名词、形容词的正常词尾，其结果是一些新阿拉米语方言中出现了前缀冠词 (源于指示代词)。名词、形容词的变格完全消失，独立使用的人称代词具有主语功能，有时作为后附词和谓语连用；代词后缀添加在名词上时表示物主，添加在动词和前置词上时表示宾语。

共同闪米特语的动词词基 (порода, *binyanim*) 在阿拉米诸语言里表现为三类：基本或简单动词词基、强化 - 使役动词词基和使役动词词基；这 3 类词基中的每一类都能借助前缀  $t$ - 构成相应的反身词基；借助词基内部屈折构成的被动形式逐渐承担起反身形式的功能。早期阿拉米诸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古典的动词两体变位体系：后缀变位形式 (完成时、完成体) 和前缀变位形式 (未完成时、未完成体)，两种变位形式在新阿拉米语方言中被按时间进行的变位所替代，这种变位以“动名 (形) 词 (分词和不定式) + 辅助动词 ‘是’ 的变位形式”为基础。除了陈述式和命令式之外，阿拉米诸语言还区分被动式，保留着强调式的残余标志。现代土语中形成虚拟式和条件式形式。句子的词序相对自由。

阿拉米诸语言的词汇中有一些外来借词，分别借自阿卡德语、古犹太语 (特别是在圣经阿拉米语中)、波斯语、希腊语 (特别在叙利亚语中)、拉丁语，后来又借自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库尔德语以及各种欧洲语言。

可以认为，对阿拉米诸语言的研究从注释旧约时代就已经开始，制定元音符系统的马所拉学士们的研究活动特别有价值。远从中世纪开始，东部和西部学者 (包括生活在西班牙的一些学者) 的很多语法著作就广为人知，如格雷戈里·巴·伊雷亚 (阿布·法刺兹，13 世纪) 研究叙利亚语并阐述方言学见解的语法学论、佚名的犹太语 - 阿拉米语 - 阿拉伯语词典《哈 - 美利茨》(10 - 12 世纪)、塔比亚·本·达尔特关于撒马利亚文字变音符号的著作等。欧洲学者研究阿拉米诸语言已经始于近代，而且主要是通过古犹太语言研究 (如 17 世纪布克斯托尔弗父子编写的古犹太语和圣经阿拉米语大词典)。18 世纪末 - 19 世纪初，包括阿拉米诸语言研究的闪米特学开始快速发展起来。

苏联有一批学者从事阿拉米诸语言的研究，发表了一些研究著作、铭文出版物 (М.Н. 博戈柳博夫、А.Я. 博里索夫、季亚科诺夫、П.К. 科科夫佐夫、А.Г. 佩利哈尼扬、К.Б. 斯塔尔科娃、Г.А. 季拉茨扬、К.Г. 采列捷利)、莎草纸文献出版物 (М.Н. 博戈柳博夫、И.М. 沃尔科夫)，还有一些专门关于撒马利亚语 (Л.Х. 维利斯克儿)、叙利亚语 (Г.М. 格卢斯基娜、К.Г. 采列捷利)、西部阿拉米语 (Г.М. 杰米多娃)、各种新阿拉米方言 (К.Г. 采列捷利、Н.В. 尤什马诺夫) 等的著作出版。И.Н. 温尼科夫编写了阿拉米铭文词典 (《巴勒斯坦集》，1958, № 3, 1959, № 4, 1962, № 7, 1964, № 11, 1965, № 13)。

Церетели К. Г.,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ассирийский язык, М., 1964.

Его же, Сирийский язык, М., 1979.

Вильскер Л. Х., Самаритянский язык, М., 1974.

N ödeke Th., Mand äsche Grammatik, Halle, 1875.

Schulthess F., Grammatik des christlich-pal ästinischen Aram äsch, T übingen, 1924.

Stewenson W. B., A grammar of Palestinian Jewish Aramaic, Oxf., 1924.

Cantineau J., Le nabat éen, v. 1—2, P., 1930—32.

Его же, Grammaire du palmyrénien épigraphique, Le Ca ñe, 1935.



- Garbini G., L'aramaico antico, «Atti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Memorie della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ser. 8, 1956, v. 7, fasc. 5.
- Brockelmann C., Syrische Grammatik, 9 Aufl., Lpz., 1962.
- Rosenthal Fr., A Grammar of Biblical Aramaic, 3 ed., Wiesbaden, 1968.
- Segert St., Altaramäische Grammatik, 2 Aufl., Lpz., 1983.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 方言地图集 (Атлас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作者: Л. Л. Касаткин; 译者: 于鑫, 天津外国语大学)

属于同一地域范围的若干**方言地图**的系统汇集,以展示一种语言或几种相邻语言的方言特点的分布情况。在方言地图集的编制工作前,须对该语言进行预先研究,了解其各种**方言**的基本特征和该语言通行区内的方言差别。方言地图集提供事先已知现象的地域分布资料,但是地图集材料收集者往往也会发现一些先前尚未知晓的语言事实。

方言地图集的性质首先取决于地图集要解决的任务。大多数区域地图集和民族方言地图集都以共时的、现代方言划分和现代发展过程的问题或者该语言通行区的历时方面的问题为研究方向,绘制跨民族方言地图集也触及到了类型学的问题。

收集材料所依据的纲要(问卷、调查表)的性质,材料收集和记录的方法,以及绘图的原则,都是由方言地图集编制者的研究课题、内容多少和实际可能来决定的。纲要囊括一种语言的所有层面,或仅仅(主要)涉及其中的一个层面,如词汇或语音等,也有可能只针对某一个不大的方面,例如动物的名称。问题的数量可以在几十个到几千个之间不等。每个问题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的词,或者一种语言现象。

最初(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些方言地图集采用两种收集材料的方法:一是直接法,即由一个地图编制人在各地进行纪录(如《法国语言地图集》);另一种是间接法,由各个地方的通讯员根据分寄到各地的统一问询表分别进行材料纪录(如《德国语言地图集》)。后来出现第三种方法,由语言学家或有语言学修养的人员集体按照统一大纲在各地收集资料。这一方法适合于绘制信息量很大的许多现代方言地图集,地图集覆盖辽阔的地域,常常包括不同的国家,描写语言体系的各个层面。方言材料用标音方式记录,这对于绘制语音地图尤其重要。调查的对象可以是绘图的地域范围内所有的居民点或其中若干个居民点。在进行非拉网式调查时,调查点的分布可密可疏,可以是均衡的,也可以是不均衡的,这取决于该地域范围内方言的单一程度。

方言地图集里的基本地图展示的是方言现象变体的地域分布,即方言差异。**语言地理学**的发展使得绘图的对象和方法逐渐发生变化。语言地理学罗曼语学派和德国学派的特点是将一个个词作为绘图的语言事实单位。莫斯科学派(主要体现在Р. И. 阿瓦涅索夫的著作中)则研拟了一套新的语言地图绘制原则。他们将地图上反映的方言差异理解为语言系统中的环节,具体的方言事实,是一系列性质不同的、普遍的和个别的方言现象的交汇线,从而提出了使用不局限于词汇的语言材料来描写语音、语法和构词现象的原则。《俄语方言地图集》从确定图绘事实在语言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出发,通过地图给予图绘事实以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性的描写。在地图上建立基本层级以及第二、第三等诸多层级的对立关系。

俄罗斯语言地理学的基本思想在苏联其他民族语言地图集和族际语言地图集的研制工作中得到发展。《乌克兰语地图集》创立了将具有结构和发生学相互联系各语言要素的通行区域叠加起来的绘图方法。《喀尔巴阡方言地图集》使用词位微观语义场绘图法。《共同斯拉夫语言地图集》则提出了以历时同一性为图绘对象的概念。

创建方言地图集是每个民族语言的**方言学**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方言地图集作为方言资料地域范围分布奠基性的总汇,是运用语言地理学方法进行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的基础。

自19世纪末开始绘制最初一批方言地图集起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绘制完成和处于收尾阶段的各种方言地图集超过150种,其中大部分都属于民族或地区方言的类型。民

族方言地图集包括语言（比如法语、乌克兰语等）的分布区或相应的行政区，如《白俄罗斯语方言地图集》就是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方言地图集。如果民族地图的地域过于宽广，就不得不将其分割为一系列区块。比如，《俄语方言地图集》就分为 5 个区块（相应地有 5 个地图分集）。在分别对每个区块进行语言地理学描写后方有可能绘制整个地域的总图集。乌克兰语和鞑靼语地图集分为 3 卷（3 个区块），哈萨克语地图集则分为 4 卷。已经出版或已绘制完毕的有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德语、荷兰语、爱尔兰语、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斯洛伐克语、卢日支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匈牙利语、吉尔吉斯语、楚瓦什语、日语等方言地图集。在波多黎各地图集出版之后，其他西班牙语美洲地区也开始了绘制民族地图集的工作。

地区方言地图集通常只包括民族方言地图集的部分地域，这使民族方言地图集的材料反映得更为精确、细致和深入。比如，一些按州（省）绘制的德、法、罗马尼亚、波兰语方言地图集就是如此。有时，地区方言地图集在民族方言地图集之前编制，成为绘制该语言地图集的前期试编，比如，G. 温克尔的最初几部德语地图集等等均属此类。

涵盖数种语言的方言地图集也在创建中。比如，《泛喀尔巴阡方言地图集》就是一个跨语际的区域方言地图集，它的任务是研究喀尔巴阡地区不同语言和方言长期相互迁移的结果状况，这些语言和方言属不同的语族（语系），它们是乌克兰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伐克语、捷克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匈牙利语。正在绘制的阿尔卑斯地区语言地图集和地中海语言地图集也属此类。大的亲属语言语族的方言地图集要解决的是另一类任务，比如，囊括欧洲所有斯拉夫语言和方言的《共同斯拉夫语言地图集》和作为《共同突厥语语言地图集》初期阶段的《苏联突厥诸语言方言地图集》。这类地图集的内容首先对这些语言的历史比较和共时类型的综合研究有重要意义。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是建构《欧洲语言地图集》。

英国编成的《中古英语晚期语言地图集》属于特殊类别的方言地图集。该书的地图不是建立在活的方言语料基础上，而是以 1350 - 1450 年期间的书面文本为基础编制的，这些文本大量反映了地域方言的特征。

最重要的方言地图集有：

《莫斯科以东各中央州俄语民间方言地图集》（Р. И. 阿瓦涅索夫主编，莫斯科，1957）、《苏联境内保加利亚方言地图集》（С. Б. 伯恩斯坦主编，莫斯科，1958）、《Й. О. 津泽夫斯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喀尔巴阡州乌克兰语民间方言地图集（词汇）》（1 - 2 卷，乌日格罗德，1958 - 1960）、《白俄罗斯语方言地图集》（Р. 阿瓦涅索夫、К. К. 克拉皮娃、Ю. Ф. 马茨凯维奇，明斯克，1963）、《喀尔巴阡方言地图集》（莫斯科，1967）、《摩尔多瓦语言地图集》（Р. 乌德列尔，В. 科马尔尼茨基，1 - 2 卷，基什尼奥夫，1968 - 1972）、《共同斯拉夫语言地图集 导论卷：总则、参考资料》（莫斯科，1978）、《乌克兰语地图集》（第一卷，基辅，1984）、《俄语方言地图集，苏联欧洲中央部分》（Р. И. 阿瓦涅索夫、С. В. 布罗姆莱主编，第一卷，语音，莫斯科，1986）、《法国语言地图集》（J. 吉叶龙、E. 艾德蒙主编，1 - 7 卷，巴黎，1902 - 1912）、《德国语言地图集》（F. 芮德主编，W. 马丁、W. 米茨卡续编，1 - 19 卷，马尔堡，1926 - 1954）。

Йордан Й., Ром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пер. с рум., М., 1971.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атласы и карты. Сост. Т. Н. Мельникова и Н. Л. Сухачёв. Под ред. М. А. Бородиной, Л., 1971 (ротапринт).

Сухачёв Н. Л.,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ласы и карты, в кн.: Проблемы картографирования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Л., 1974.

Толстая С. М.,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польской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 (кратки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Советское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 1973, № 5.

Миронов С. А., Немецкая диалектография за сто лет,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76, № 4.

Pop S., La dialectologie, pt. 1 - 2, Louvain, 1950.

Pop S., Pop R. D., Atlas linguistiques européens. Domaine roman, Louvain, 1960.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 亚非诸语言（Афразий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 **В.Я.Порхоновский**; 译者: **赵亮**,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阿非罗 - 亚细亚诸语言, 旧称闪米特 - 含米特诸语言或含米特 - 闪米特诸语言) 是一个超语系, 通行于从大西洋沿岸、加那利群岛到红海沿岸的非洲北部, 以及西亚和马耳他岛。在基本通用区之外的很多国家中都有操亚非诸语言 (主要是**阿拉伯语**的不同方言) 的族群。使用该超语系的人口约为 2.53 亿。亚非诸语言中还包括许多已经消亡的语言, 有大量的古代文献可资证明。西亚和非洲东北部有可能是使用亚非诸语言的最初区域。关于亚非诸语言的发源地问题, 即通过假设重构的亚非诸语言原始语最早通行地区的问题, 目前仍无定论。在大概不迟于公元前第 8 至第 9 个千年 (也可能更早) 时, 该原始语分解为独立的方言组群。科学文献中对亚非诸语言发源地的一些假设进行了论证, 有的假设认为在西亚, 有的认为在非洲 (撒哈拉的东北部和 / 或东非毗连撒哈拉的地区)。但非洲起源说在解释亚非诸语言同许多欧亚语言存在远古接触和联系的问题上遇到困难。

亚非诸语言分为 5 个 (或 6 个) 主要语族: **闪米特诸语言、古埃及语、柏柏尔 - 利比亚诸语言、乍得诸语言、库施特诸语言和奥摩特诸语言**。目前尚不清楚奥摩特诸语言是亚非语系第 6 个单独的语族, 还是库施特语族最早分出的一个语支。

属于闪米特语族现在仍使用的语言有阿拉伯语 (除了古典阿拉伯标准语, 还有阿拉伯半岛的不同方言, 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独立方言, 诸如埃及方言、叙利亚方言、苏丹方言、伊拉克方言、马格里布方言、哈萨尼亚方言、绍阿方言等等, 此外还有**马耳他语**)。

埃塞俄比亚的闪米特诸语言是一个庞大的语支。其中包括**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北部的**蒂格赖 (提格里尼亚) 语**和**提格雷语**, 以及一些较小的语言 (参见**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诸语言**)。闪米特语族现在仍使用的语言还包括**伊夫里特语**、阿拉伯半岛和索科特拉岛南部少数没有文字的语言 (马赫里语、施哈乌里 (或称吉巴利) 语、索科特拉语等), 新阿拉米语的方言 (叙利亚一些地区的一些村落所使用的为数不多的阿拉米西部方言) 和现代**亚述语**。其余的闪米特诸语言均为消亡语言。从发生学的特征看, 闪米特语族可分为五个语支: 1) 北部周边语支, 或称东部语支, 有阿卡德语 (亚述 - 巴比伦语); 2) 中北部 (或称西北) 语支: a) 迦南次语支, 具体包括古迦南语、亚摩利语、**乌加里特语、古犹太语、腓尼基 - 布匿语、摩押语、亚乌迪语** (属于该次语支的可能还有埃卜拉语, 叙利亚北部曾发现该语文献); b) 阿拉米次语支, 具体包括古阿拉米语、“帝国”阿拉米语和很多方言, 这些方言可以分为两个组群: 西部方言组群 (帕尔米拉语、纳巴泰语、巴勒斯坦语等) 和东部方言组群 (叙利亚语, 或称埃德萨语、曼德语、巴比伦塔木德语等); 3) 中南部语支, 为阿拉伯语; 4) 南部周边语支, 包括梅赫里语、沙赫里语、哈尔苏西语、索科特拉语、巴塔里语等; 这些语言同阿拉伯南部的古代碑文文献语言 (萨贝语等) 传统上是合并在一起的, 虽然它们有可能构成闪米特语族单独的语支; 5) 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支, 包括北部次语支, 即**吉埃兹语**, 或称埃塞俄比亚语、蒂格赖语、提格雷语; 南部次语支: a) 加法特语、索多语、戈戈特语、穆赫尔语、马斯坎语、埃扎语、恩涅莫尔语等; b) 阿姆哈拉语、阿尔戈巴语、哈拉里语、兹瓦伊语等。

亚非诸语言中的埃及语族是已经绝迹了的古埃及语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科普特语**, 后者源于 17 世纪的口语用法, 现作为祭祀语言使用。

柏柏尔 - 利比亚语族包括非洲北部和撒哈拉地区柏柏尔各民族的很多种语言和方言, 这些语言和方言的主要分支有: 塔舍尔希特 (或称希尔赫、什卢赫、什廖赫) 语、泽涅特语支 (里夫语、森哈亚语、卡比尔语、沙维亚语、姆扎布语等); 内富萨语、加达梅斯语, 西瓦语等; 图阿列格诸语言 (加特语、塔马舍克语、塔内斯勒姆特语等); 泽纳加语。柏柏尔 - 利比亚语族中还包括已消亡的古利比亚诸语言 (西努米底亚语和东努米底亚语)。加那利群岛已经绝迹的关切诸方言与柏柏尔 - 利比亚诸语言很相似, 前者也许应当看作单独的语支, 按照这样的观点, 柏柏尔 - 利比亚语和关切语将共同构成为亚非诸语言的利比亚 - 关切

语族。

乍得语族由 150 多种语言和方言构成，它们分布在苏丹中部、尼日利亚北部、喀麦隆北部和乍得共和国紧靠乍得湖的地区。其中最大的一种语言是**豪萨语**，豪萨语是跨民族的交际语，使用广泛。乍得诸语言分为三个语支：1) 西部语支（尼日利亚），包括豪萨语、安加斯语、苏拉语、罗恩语、博勒（博勒瓦，博朗切）语、卡雷卡雷语、坦加勒（坦格勒）语、德拉（卡纳库鲁）语、瓦尔杰语、帕亚语、扎尔（赛安奇）语、巴德语、恩吉津语等；2) 中部语支（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包括特拉语、加安达语、布拉（帕比尔）语、马尔吉语、希吉语、巴塔（巴查马）语、拉芒（希德卡拉）语、曼达拉（万达拉）语、吉西加语、吉德尔语、科托科语、穆斯贡语、马萨（巴纳纳）语等；3) 东部语支（乍得），包括克拉语、克万格（莫德格尔）语、松赖语、索科罗语、当格拉语、穆比语、杰古语等。

库施特语族包括非洲东北部的一些语言，这些语言分布在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最为主要的语言是**奥罗莫（加拉）语**、索马里语。库施特语族分为五个语支：1) 北部语支，包括贝督耶（贝贾）语；2) 东部语支，包括萨霍语、阿法尔语、索马里语、伦迪勒语、奥罗莫（加拉）语、康索语等；3) 锡达莫语支，包括锡达莫语、哈迪亚（古德拉，马拉科）语、坎巴塔语、布尔吉（班巴拉，阿马尔）语；4) 南部语支，包括伊拉库语、布龙格（姆布龙格）语等；5) 阿高语支，包括比林语、哈密尔语、汉坦加（汉塔）语、昂基（阿维亚）语等。由奥梅托语（包括沃拉莫、哈鲁罗、巴斯克托等方言）、雅马语、卡法（卡菲乔）语、莫查语等构成的语支传统上被看作库施特语族的西部语支。一些语言学家（H. C. 弗莱明、L. 本德）根据比较形态分析的资料，建议将这个语支（他们称作**奥摩特语支**）看作亚非语系的第六个语族。但有可能库施特语支和奥摩特语支在起源上构成了一个单独的整体，这样的话，奥摩特语支就成为传统意义上库施特诸语言最早的分支。

现在仍使用的亚非诸语言在类型学方面彼此差别悬殊，原因是它们距离共同亚非语语言状态的年代十分久远，而且缺少各种各样非亲属语言环境下的相互接触。在各个语族内部，闪米特诸语言，尤其是古代闪米特诸语言之间、柏柏尔 - 利比亚诸语言之间比较接近，虽然，在传统的柏柏尔语研究中，柏柏尔 - 利比亚诸语言相互间的接近程度被严重夸大了。乍得诸语言和库施特诸语言（包括奥摩特诸语言）从类型学视角着眼的多样性更加显著。有关共时的类型学特征请参见亚非诸语言各个语族的相关条目。

在历史比较研究方面，亚非诸语言为重构亚非语原型提供了广泛的材料。苏联对亚非诸语言词汇进行的历史比较研究表明，可以重构大约 1000 个共同亚非语词根。

亚非诸语言音位系统的特点表现为清辅音、浊辅音和“强势辅音”的三元对立。在原始亚非语中，“强势辅音”重构为清声门化音，其语音在不同语言中的体现可能差别很大，分别可体现为声门化音、咽化音（通常伴随浊化）、软腭化音、内破音（即声门化前的声门吸气音（*injektiv*），通常为浊音）、翘舌音等。这种三元对立的现象在大多数亚非语中都有体现，其中的“强势辅音”可能是派生的，如像在很多乍得语言中那样，但是，乍得语中固有“强势辅音”的反映也广泛存在。亚非诸语言辅音系统的另外一些特点是阻塞擦音和啞音系统丰富、有后软腭辅音（包括咽擦音和喉擦音）、喉塞音以及作为辅音使用的非音节音素  $\underset{\cdot}{j}$  ( $y$ )， $\underset{\cdot}{w}$  ( $w$ )。共同亚非语的三个元音  $a$ ， $i$ ， $u$  很可能源于时间更早的二元对立元音  $a$  和  $e$  ( $> i$ ， $u$ )；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对立出现可能在较晚的阶段。库施特（包括奥摩特）和乍得诸语言有音位**声调**。

亚非语实词词根具有 CVC（辅音+元音+辅音）或 CVCVC（辅音+元音+辅音+元音+辅音）的结构。根据 И.М.季亚科诺夫的理论，由三个辅音构成的原始词根中，第二个和第三个辅音为响辅音，也就是说，既有构成音节的功能，也有不构成音节的功能。在响辅音丧失音节构成功能时，这类词根就构成初始的三辅音词根组。其他构成三辅音词根的途径是第二

个词根辅音的叠音化，或者在第二或第三个词根辅音位置上出现“弱”辅音  $i, u, ?$ ；在弱辅音出现之前可能曾发生元音的延长，该延长元音可以解释为短元音和“弱”辅音的组合。各种词根构成成分（后来词汇化）的接续是词根延长的又一途径。这一过程实际上导致按三辅音模式构成的词根在闪米特语族和埃及语族中占绝对优势。在柏柏尔 - 利比亚语族、库施特语族和乍得语族中，喉音和“弱”辅音的减少导致了派生双辅音词根的产生。在闪米特诸语言和古埃及诸语言中保存了为数不多的原始双辅音词根。很难断定其他语族的双辅音词根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古代，也就是说很难判断这些语族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三辅音化，以及是否可以将三辅音化理解为亚非诸语言所共有的过程。在较后的一个阶段里，随着复合构词、词缀词汇化和借词的出现，柏柏尔 - 利比亚、库施特和乍得诸语言中产生了大量包含两个以上辅音的派生词根。

动词词法学的特点是体现了完成体（短时体）和未完成体（持续体、无界限体）的对立。这种对立最为古旧的表达方法是简单（非全元音）的完成时词干与加中缀 -a- 的派生（全元音）未完成时词干的对立。这种模式在闪米特语族的阿卡德语、南阿拉伯诸语言和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诸语言中，以及柏柏尔 - 利比亚、库施特和乍得诸语言的个别成员中保留下来。

很多亚非语言丧失了这种初始的词干对立，这些语言中的完成体 / 未完成体对立开始借助附着于动词的主体标记、动词综合体中的专门语气词来表示。以初始的完成体和未完成体对立为基础，亚非诸语言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时体形式变位系统。这一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原来无标记的完成体（非派生词干）被有标记的所排挤。旧的完成体形式于是用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情态意义，或者逐渐停止使用（如只保留在助动词中或特殊的句法结构中）。完成体形式的替换过程在个别语言的历史中可能重复多次（如在一些埃塞俄比亚语言中出现了两次）。

埃及语以限定名词结构和前置词名词结构为基础形成了独特的时 - 体形式系统。乍得诸语言中，通过在不变的动词词干上添加分析性主体标志（分析性主体标志应当起源于主格代词与助动词词干的组合）来实施时体形式的变位。在大多数库施特语的动词中，类似的分析结构是派生后缀变位的基础。但在一些语言（贝督耶语、达纳基尔诸语等）中，古旧的前缀变位保存了下来，这种变位与闪米特语和柏柏尔语的变位一致，起源于原始亚非语。

亚非诸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拥有丰富的派生动词词干系统——**词基**（породы, binyanim）系统。通过重叠或者添加词缀 t-, n- 或 m-, s-（原始亚非语中大约为 š-），a- 构成的词基可以溯源至共同亚非语。

亚非诸语言的名词具有数范畴、性范畴（许多乍得语言和库施特语言中的性范畴已消失）、格范畴（仅保留在古闪米特诸语言和古埃及诸语言中，在其他一些语言中仅存在个别的残迹）；还有名词的状态（地位）范畴系统，限定结构分布广泛。亚非诸语言的代词系统彼此近似，尤其是后缀化了物主代词以及在许多方面与其重合的后缀化宾格标志。

亚非诸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底层语的影响和接触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相互的，也有不均衡的（例如苏美尔底层语对阿卡德语的影响或西非诸语言对乍得诸语言的影响）。这些语言迁移的过程既可能发生在亚非诸语言的现代分布地，也可能发生在亚非语言使用者的迁徙途中。

亚非诸语言中有许多语言的文字传统十分悠久、丰富。**埃及文字**产生于公元前第 4 个千年和第 3 个千年之交，已有三千多年的连续传统。公元前第 3 千年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以苏美尔**楔形文字**为基础产生了阿卡德（亚述 - 巴比伦）文字传统（表词 - 音节文字），这种文字一直使用到新纪元之初。埃卜拉语书面文献（以苏美尔 - 阿卡德语文字体系为基础）的时代早在公元前第 3 个千年的下半叶。

**乌加里特文字**以准字母文字体系（与苏美尔 - 阿卡德楔形文字无关，而与西闪米特音节文字表的符号顺序相似）为基础，其所处时间被确定为公元前第 2 个千年中

叶。用西闪米特准字母文字书写的文献——原始西奈铭文、古巴勒斯坦铭文、原始比布鲁斯铭文等）（参见**西闪米特文字**）大体也属于这个时代或略早一些。公元前第2千年与第1千年之交出现用线性准字母文字写成的比布鲁斯铭文，这种文字由22个符号构成；之后的所有闪米特音节文字体系都源于该腓尼基体系，闪米特音节文字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南阿拉比亚文字系统（由此而产生**埃塞俄比亚文字**）、古犹太文字系统、叙利亚文字系统和阿拉伯文字系统。在腓尼基音节字母表的基础上产生了**希腊文字**，而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字母表都是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创立的。

一些亚非诸语言的文字传统始于近代，它们通常使用经过一些变动的**阿拉伯文字**或**拉丁文字**。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诸语言（阿姆哈拉语、蒂格赖语和提格雷语等）以及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一些库施特语言使用埃塞俄比亚文字。分布于撒哈拉周边地带的图阿雷格语（属于亚非诸语言的柏柏尔-利比亚语族）继续使用传统的柏柏尔辅音文字——提芬纳格文字，该文字起源于利比亚文字（努米底亚文字），后者可能与布匿文字有关，并进而与腓尼基文字有关。一些起初用阿拉伯文字（所谓的阿贾米文字）的语言后来转而使用拉丁文字。有些语言（如豪萨语）同时使用两种文字。很多现代亚非语没有文字。

通常认为，对亚非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始于1781年，在这一年A.L.施勒策尔提出将近东的一些消亡语言归入同一语支，这些语言的相似之处此前已经被发现。他基于圣经族谱将这些语言称作闪米特诸语言。1863年，K.R.莱普修斯提出把一系列语言（首先是古埃及语，其次是一些库施特语、柏柏尔语和豪萨语）合并为含米特语族，而含米特语族和闪米特语族合并为闪米特-含米特语系或含米特-闪米特语系（参见**含米特诸语言**）。与此后亚非诸语言的研究进步相关的是：发展闪米特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和闪米特-埃及诸语言研究、揭示“含米特”语族的构成和“含米特”诸语言内部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闪米特诸语言间的关系特点，这些研究内容都反映在19至20世纪语言学家的著作中（F.W.K. 缪勒、C. 洛特纳、E. 勒南、T. 本费、R.N. 卡斯特、L. 莱尼什、C. 布罗克尔曼、A. 埃尔曼、C. 迈因霍夫、D. 韦斯特曼、J. 卢卡斯、A. 特隆贝蒂、O. 廖斯勒尔、W. 维齐赫尔、E. 齐拉尔茨等）。20世纪中叶，M. 科恩和J.H. 格林伯格最终确认亚非语系范围内不存在特别的含米特语言的发生学统一体。因此格林伯格建议不再使用术语“闪米特-含米特诸语言”，而改用术语“阿非罗-亚细亚诸语言”（Afro-Asiatic languages）。在苏联语言学中采用了季亚科诺夫提出的术语“亚非诸语言”。起初，在重构语言原型时大都以古代书面文献语言为研究目标，20世纪下半叶，转而关注所有亚非语言材料，包括没有文字的现代语言，结果人们对原始亚非语音位系统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之前实际上将其等同于原始闪米特语的状况）。季亚科诺夫的著作在亚非诸语言的形态重构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关于亚非诸语言问题定期召开国际会议，发行专门的期刊。

Дьяконов И. М., Семито-хамит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65.

Его же, Языки древней Передней Азии, М., 1967.

Его ж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к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йших носителей афрази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в кн.: Africana. Африканский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 10, Л., 1975.

Дьяконов И. М., Порхомовский В. Я., О принципах афразийск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в кн.: Balcanica.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1979.

Порхомовский В. Я., Афразийские языки, в кн.: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ов разных семей. Задач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 1982.

его же, Проблемы генетической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языков Африки, в кн.: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языков мира. Проблемы родства, М., 1982.

Cohen M., Essai comparatif sur le vocabulaire et la phonétique du chamito-sémitique, P., 1947.

Greenberg G.,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Bloomington, 1963.

Linguistics in South-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CTL, 1970, v. 6.

Actes du premier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inguistique sémitique et chamito-sémitique, Paris, 1969. Réunis par A. Caquot et D. Cohen, The Hague — P., 1974.

Hamito-Semitic, ed. by J. and Th. Bynon, The Hague — P., 1975.

The Non-Semitic languages of Ethiopia, ed. by M. L. Bender, East Lansing, 1976.

Atti del Secondo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linguistica camito-semitica, 1978.

Diakonoff I. M., Afrasian languages, М., 1988.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афрази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в. 1—3, М., 1981—86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и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研究亚非诸语言的文献除了普通语言学杂志(参见**语言学杂志**)外,还刊登在一些国家的专门杂志上,这些杂志有:

«Comptes rendus du Groupe linguistique d'études chamito-sémitiques»(P., 1935—).

«Afroasiatic linguistics»(Malibu, США, 1974—).

关于该语系闪米特语族的出版物数量较多: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Chi., 1884—95 — «Hebraica», затем до 1941 —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Zeitschrift für Semitistik und verwandte Gebiete»(Lpz., 1922—35).

«Semitica. Cahiers publiés par l'Institut d'études sémitiqu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P., 1948—).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Manchester, 1956—).

«Semitics»(Pretoria, 1970—).

«Journal of Northwest Semitic languages»(Leiden, 1971—).

«Maarav. A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orthwest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Santa Monica, США, 1978—).

Е. А. Хелимский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 布须曼诸语言 (Бушмен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 Н. В. Охотина; 译者: 陈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

**科伊桑超语系**中的一个语系,是散布于南非共和国、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全境,安哥拉北部地区以及坦桑尼亚(哈扎语)各个族群的通行语言系列。操布须曼诸语言的人数约 7 万 5 千人。有一种假设认为,使用布须曼语言的人口过去曾在整个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定居:哈扎语至今仍通用于非洲大陆东部的一个地区就是佐证。后来,使用布须曼语的人口受班图语族群(参见**班图诸语言**)移民浪潮的排挤而迁离。

布须曼诸语言分为下列主要语族: 1) 昆语族; 2) 恩古桑语族; 3) 奥尼语族; 4) 科马尼语族; 5) 哈扎(哈察)语族。这些语族多半都是不同方言的混合体。科学文献中提及的许多布须曼语都属于已经消亡的语言,如南非开普省西部地区的某些方言;还有些语言仅知道名称而已,如纳比语。

布须曼诸语言语音结构的特征是,元音系统包括 a,i,e,o 或 u; 辅音系统以双焦点音为特点,即所谓的吸气音,包括:齿吸气音 | 和 Ф、腭龈吸气音 ! 和 Ң、边吸气音 || 和 ||, 都各有送气化、挤喉化(эйктивный, ejective, 须用气流推开声门构成)、浊化和鼻音化几种变体。科伊桑超语系中,只有布须曼诸语有双唇辅音,即所谓的接吻音(kissound),用符号⊙标示。与**霍屯督诸语言**相比,布须曼诸语言中的吸气音所占的比例较低,试比较:昆语(属布须曼诸语言)中占 18%,而科拉(科拉纳)语(属霍屯督诸语言)中占 44%。吸气音在词形中所处的位置无标记,但仅出现在词根中。词的结构倾向于单音节模式,双音节模式很少:CV(辅音+元音)、CVC(辅音+元音+辅音)、CCV(辅音+辅音+元音)。

在类型学上,布须曼诸语言被看作表现出一定**黏着**特征的孤立语。布须曼诸语言的研究不平衡,力度不够,这尤其表现在词法、句法方面。名词和动词的形态系统,不同的布须曼语是不一样的。在一些布须曼语言中有性(阳性和阴性)的范畴,通过后缀来标记,如 kwe-ba

‘男性’、kwe-sa ‘女性’(纳龙语);也有数的范畴(单数、双数和复数),如 kwe-či ‘男人们’、kwe-si ‘女人们’、kwe-čəra ‘俩男性’、kwe-šəra ‘俩女性’(纳龙语)。

在有些布须曼语言中,性范畴并不是名词的区别特征,而复数形式则是借助词根重叠构成。动词的时、体聚合体并非通过词根变化表示,而是借助置于动词词根前的词缀表示,如持续现在时 re'- (奥尼语)、将来时 ka- (纳龙语和奥尼语)。动词的人称范畴由前置的人称代词表达。代词系统发达: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物主代词,它们都有单数、双数、复数形式。大多数布须曼语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有性的变化(阳性、阴性、共性)。形容词在

性和数上与名词保持一致。在句子中名词表示的主语和动词表示的谓语无一致关系。词序为SPO（主谓宾）。简单句居多。

布须曼诸语言都是无文字的语言，其地位仅限于狭窄族群内部的交际用语。

对布须曼诸语言的描写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D.布里克的著作数量最多，有理论为依据；一些已经消亡的布须曼语得益于她的著作才为人知晓。C.M.多克、W.普拉涅尔和D.齐尔福格尔发表了一些关于个别布须曼语言及其语音或语法体系诸多特点的论著；E.O.J.韦斯特法尔、J.H.格林伯格也曾研究布须曼诸语言，目的是确定其在非洲语言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Bleek D., *The Naron. A Bushman tribe of the Central Kalahari*, Camb., 1928.

Eë же, *Comparative vocabularies of Bushman languages*, Camb., 1929.

Eë же, *Bushman grammar*, «Zeitschrift für Eingeborenen-Sprachen», 1928—30, Bd 19—20.

Planert W., *Über die Sprache der Hottentotten und Buschmänner*,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1905, Bd 8.

Vedder H., *Grammatik der Buschmann-Sprache vom Stamm der Ku-Buschmänner*, «Zeitschrift für Kolonialsprachen», 1910—11, Bd 1—2.

Doke C. M., *An outline of the phonetic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hū; Bushman of the North-West Kalahari*, «Bantu studies», v. 2, 1923—26, 1929—65.

Ziervogel D., *Note on the language of the Eastern Transvaal Bushmen*, Pretoria, 1955.

Westphal E., *The non-Bantu languages of Southern Africa*, в кн.: Tucker A. N., Bryan M., *The non-Bantu languages of North-Eastern Africa*, L. — N. Y., 1956 (suppl.).

Greenberg J.,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963, v. 29, № 1, pt 2, Jan.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 语言的谱系分类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

(作者: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译者: 宁琦, 北京大学)

在确定语言间亲属关系(把语言归入某一语系、语族)的基础上,即在假设原始语共同起源的基础上,对世界语言的研究和分类。每一个语系都是由某一种语言(该语系的原始语)彼此分离的方言发展而来。如所有罗曼语都源自罗马帝国大部分居民在帝国分裂前所使用的民间拉丁语(俗拉丁语)方言。要按照语言谱系分类确定某一语言的地位,就须将其与同一语系的其他亲属语言(参见语言亲属关系)和它们的共同原始语(该原始语通常只有在将所有这些语言彼此加以比较、重构的基础上才能明了)用历史比较法加以比对。有些语系形成于原始语的某一方言通过文字固定下来前不久(如斯拉夫语诸语言和突厥语诸语言那样),它们的初始原始语的存在和特征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重构的原始语同其书面和口头的后代语言在时间上间隔越远,重构的原始语同其书面或口头的后代语言间隔的时间愈是久远,该原始语就体现得愈不清晰。语言谱系分类最可靠的结果可通过比较形态标志来获得,比较之所以容易,首先取决于语义方面的原因(世界所有语言可能具有的语法意义都是有限的,这些语法意义非常稳定,可能发生的意义变化明确清晰,遵循严格的规则,如表示式或体的形素可获得时间意义等),其次取决于词素音位性质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每种语言的全部音位只有相对少的部分用于词尾,这减少了确立语言间对应关系的困难,当吻合的形式由相同的词根构成,其对应关系扩大到整个词形时尤其如此(试比较:由共同印欧语 \*es-mi 构成的古斯拉夫语 *jes-mь*, 古印度语 *ś-mi*, 赫梯语 *eš-mi* ‘我是’; 由共同印欧语 \*es-ti 构成的古斯拉夫语 *jes-ть*, 古印度语 *as-ti*, 赫梯语 *eš-ti* ‘他是’等)。在使用与词形中词重音位置变化相关的词素音位交替的语言中,同一个聚合体范围内彼此相关的整组词形在起源上也可能是彼此相同的(古印度语 *hán-ti*、赫梯语 *kuen-zi* ‘他在打、在杀’源自共同印欧语 \*g<sup>wh</sup>en-ti, 古印度语 *ghn-ánti*、赫梯语 *kunanzi* 源自共同印欧语 \*g<sup>wh</sup>n-ánti; 赫梯楔形文字中古代的重音位置由类似长元音的元音重复书写来表示)。当具有同样意义的这些等同形式系统存在时,将拥有形态标志的几种语言归属于同一个语系(上述例子中的那些语言归属于印欧语系)是无可置疑的。

将语言间的词汇对应关系用于语言谱系分类则要复杂得多。如在数词之类的领域中,可以将一种语言的整组词借用到另一语言中,但即便这些词汇对应关系遵循特定规则而呈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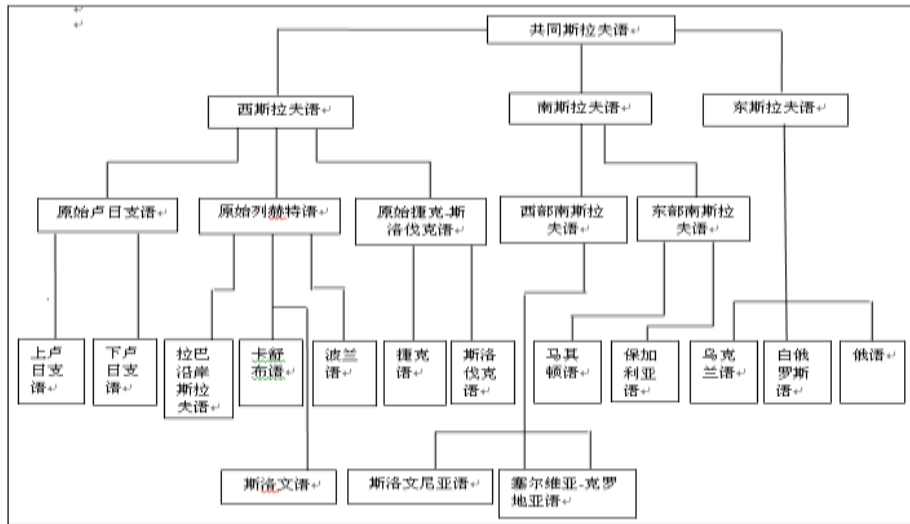
性，也不能直接由此得出若干语言归属同一语系的结论。现代日语数词从‘一’到‘六’与现代藏语数词相吻合（参见表格），这只是因为日语一千多年前，在中国对其（日本）文化影响强大的时期从汉语引进的缘故（在日语中还有一个固有的数词系统与其并存），而汉语终究是藏语的亲属语。同时，藏语本身的语音发展导致古藏语词的语音结构的简化（丧失了古起始音位组中的第一辅音等），这样，现代藏语的形式（拉萨方言形式）就比古藏语更接近日语。但倘若不知道古藏语形式而直接比较现代日语和藏语数词的话，就有可能在语言谱系分类方面得出错误的结论。直到不久之前曾流行尝试对许多无文字语言（如非洲语言）进行对比，这些研究大多以语言中相对少量的常用词比较为基础。给予这种方法以某种依据的是词汇统计学（**语言年代学**）（对于没有发达词尾系统的语言而言，该方法由于没有语法比较对于词汇比较的监督，可能无法获得最终的结论）。根据词汇统计学，语言在数百个（一百或两百个）最常用词界限内的变化速度通常十分缓慢，尽管这种速度受语言发展条件制约，也可能有所不同（试比较：与其他语言不直接接触的语言极其缓慢的变化，如冰岛语；参见**语言接触**）。在语言的谱系分类中，为了得出有关语言亲属关系的结论，通常曾经使用的正是这种比较类似的最常用词的方法。然而对彼此长期接触的澳大利亚诸语言不同亚语族（所有这些亚语族都最终发端于共同澳大利亚语，而从共同澳大利亚语瓦解至今已有数千年之久）的词汇比较表明，在特定的社会组织类型和社团的成员数量有限的条件下（这使不同部落间的频繁杂婚成为必然），大量的最常用词（包括很多表示亲属关系的术语、动植物名称、数词以及一系列动词）可以从一种语言借入到另一种语言之中。那些曾经具有原始亲属关系，而在后来又发生接触的语言里，出现这类词汇间的联系是十分频繁的（就如澳大利亚诸语言发生的情况那样）。古英语在古斯堪的纳维亚各部落征服不列颠时期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接触也是一个例子（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渗透入古英语的不仅有很多常用的名词，还有诸如复数第三人称 **they** 之类的代词等。

日、藏、汉语数词

| 数词意义 | 日语   | 现代藏语 | 古代<br>(古典文字)藏<br>语 | 现代汉语 |     |
|------|------|------|--------------------|------|-----|
|      |      |      |                    | 字    | 读音  |
| ‘1’  | ichi | ji   | gčig               | 一    | yi  |
| ‘2’  | ni   | ni   | gñis               | 二    | er  |
| ‘3’  | san  | song | gsum               | 三    | san |
| ‘4’  | shi  | xi   | bži                | 四    | si  |
| ‘5’  | go   | enga | lña                | 五    | wu  |
| ‘6’  | loku | chu  | drug               | 六    | liu |
| ‘9’  | kuu  | gu   | dgu                | 九    | jiu |
| ‘10’ | juu  | ju   | bču                | 十    | shi |

由于两种彼此接触的语言十分相近（类似的如古斯拉夫语、后来的教会斯拉夫语及古俄语因文化 - 历史因素而相互作用），同一词可能有两种平行的形式（如古英语 **ey** ‘蛋’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 **egg** > 现代英语 **egg** ‘蛋’；俄语 **надежа** ‘希望’和教会斯拉夫语 **надежда** ‘希望’），过后其中的一个词（在很多情况下是借词，如上文例举的那样）会胜出。若有古文献存在（如古英语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古俄语和古斯拉夫语），可据此追踪这种发展的轨迹。如没有这些文献，或是（这种情况大概在世界大多数语言的历史中都曾有）两种原始亲属语言后来的混合过程已年代十分遥远，只能仔细地运用历史比较法，区分词与词之间的音素对应类型，以勾勒出混合的途径。比如，有人推测，在与伊朗语有自古亲属关系的共同斯拉夫原始语的词汇中，存在整整一个借自伊朗语的词层 [共同斯拉夫语的一些具有宗教 - 社会性质的术语，如斯拉夫语 \* **bogъ** ‘上帝’ < 伊朗语 **baga** ‘上帝’，个别词连同其语法

意义：古斯拉夫语 ради ‘为了（前置词）’与古波斯语 rādiy（用于古波斯语类似 bagahay rādiy ‘看在上帝的面’等的短语]。



斯拉夫语谱系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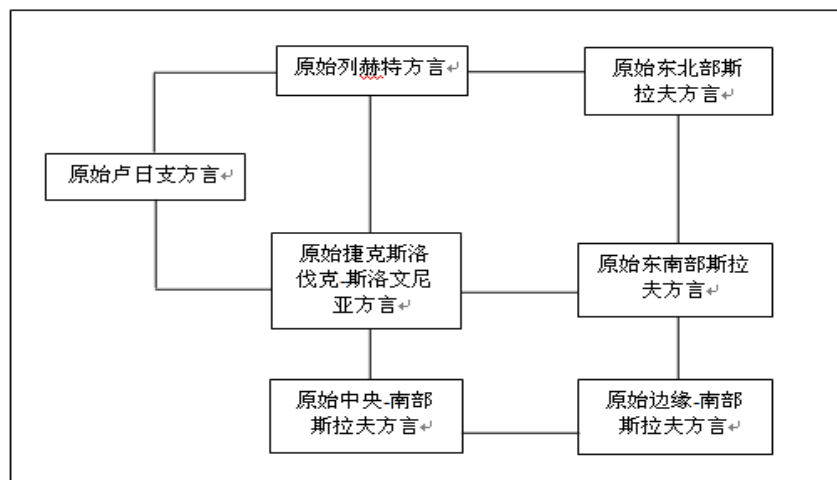
图 1

原始亲属语言的这种混合过程使得许多语言的词汇中存在着两类词：直接起源于该语言古代“原始”状态的词及其“表亲”，即出自与该语言有近亲关系、但又与之相区别语言的词（拉脱维亚语中的库尔施 - 波罗的海语借词、波斯语中的米提亚语词、古希腊语中的“前希腊语”或“佩拉斯吉语”的印欧语借词等）。在语言谱系分类中，当出现大量“双重词源词”时，将这种语言归入若干语言的亚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是约定性的。归根结底，一组方言发展过程中出现看似偏离语音规律的现象，正是由于这种近亲语言和方言词汇持续相互作用的缘故。20 世纪 70 年代，运用计算机对各种汉语方言从中古汉语到（彼此相距甚远的）现代方言的千年发展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

语音规律仅在局部场合发挥作用。这不是由于决定方言从每一前发展阶段过渡到后发展阶段（最短时间跨度为一代人）应发生的正确语音变化（像使用现代英语诸多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的大量历史材料验证的那样）没有发生，而是由于方言之间（语言之间）长期（如在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积极混合的缘故。因而 W. 拉波夫及其他现代语言学家在著作中指出的关于青年语法学派语音规律无例外原则和亲属语言（方言）语音彼此对应的实际复杂性之间看似相互矛盾的问题，就可以解释为，大多数亲属语言（方言）在彼此分离之后，有再次语言接触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大量的词（其中包括最常用词）从一种语言（方言）借入另一种语言（方言）。在传统的语言谱系分类中，通常只是确定初始起算点（出自一种语言诸多方言的若干语言的原始共同语），但是这种简单化描写只有在亲属语言后来彼此永不接触的情况（相对罕见）下才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叠加在语言原始关系之上的再次积极混合过程却是可能的，不过一般来说，借助历史比较语音学的方法，可以将后来涌现的借词（体现另外一种语音对应系统）与诸亲属语言从初始传承下来的词汇成功地区别开来。

对于非亲属语言（或亲属关系十分遥远的语言）而言，当它们具有词尾系统（通常这个系统无法从一种语言借用到另一种非亲属语言）时，大多数情况下很容易把固有词从后来接触的结果中分离出来，因此，语法形素组成中音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用作比较共同初始词汇（相应地无法用借词来解释）的检验材料。如果在该组语言中没有词尾系统，检验材料也就不存在。这时，有关词属于共同初始词汇的结论就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选项之一的解释可能是再次获得的（Г. Б. 采列杰利称之为谱系变体的）语言亲属关系。再获亲属关系假说在语言的句法层面现象与词法现象毫不相关、语音结构相似的情况下尤其可

能：处于同一**语言联盟**（如巴尔干语言联盟）范围内的各种语言，在后来的地域接触中会经常产生语音结构相似的现象。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E. Д. 波利瓦诺夫，H. C. 特鲁别茨科伊，V. 皮萨尼），语言谱系分类中的一些语系事实上常常（如印欧语系）也是语言联盟。



原始斯拉夫语领域的诸方言间联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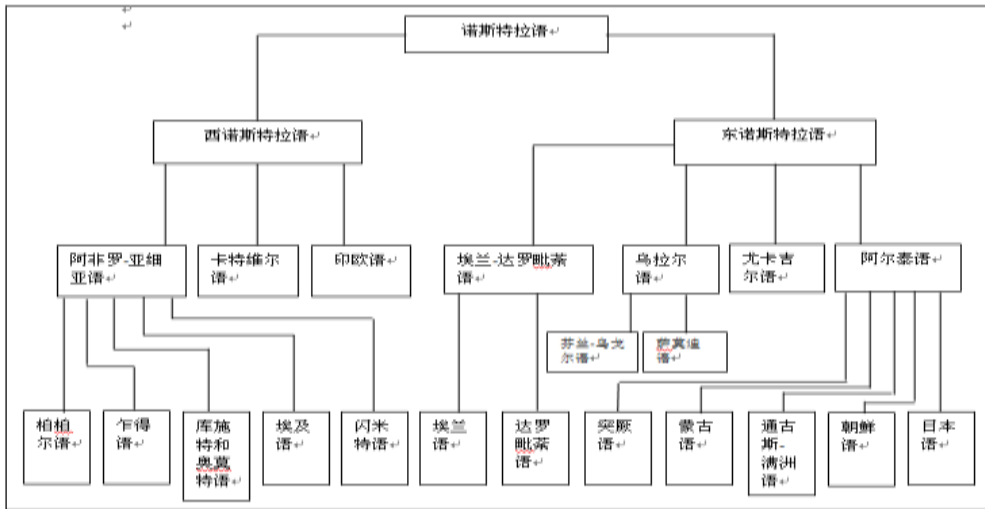
图 2

如果亲属语言或方言彼此之间没有完全停止接触，则第二次发生的语言间（方言间）的联系可能会覆盖较早前的联系，致使根据谱系树原则按时序展开语言的谱系分类发生困难。谱系树原则的前提是：每一个共同语（原始语）分裂为两个或多个原始语，这些原始语也同样再可能进一步分裂为两个或多个过渡原始语，由这些过渡原始语（原则上不排除过渡原始语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可能发展成现在已知的语言。如所有已知的斯拉夫语言最早都源于共同斯拉夫语（斯拉夫原始语），后经三种过渡原始语（西斯拉夫语、南斯拉夫语和东斯拉夫语）的中介发展而来，而且可以假设还存在另外的一些过渡原始语（见图 1）。斯拉夫语谱系树，与许多其他语言的谱系树一样，都是一种为方便起见而使用的简化图式，只在极小的程度上反映方言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就斯拉夫语而言，毋庸置疑的是，南斯拉夫亚语族并不是过渡原始语实际发展的结果。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操匈牙利语的人移居匈牙利之后，南斯拉夫亚语族与其他斯拉夫语方言脱离，后来又在与巴尔干语言联盟诸语言的接触中发展起来。在此之前，后来发展成斯洛伐克语和捷克语的部分西斯拉夫方言，曾与后来发展成斯洛文尼亚语的方言有联系，而另外一部分形成列克提克诸语言的西斯拉夫方言则具有某些与古东斯拉夫语北部方言相同的特点，古东斯拉夫语北部方言后来又派生一种方言，这一方言因 10 - 12 世纪的诺夫哥罗德桦树皮文献开始起为人所知。如果根据后来发展成的那些语言来表示当初的原始斯拉夫语古代方言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区分出 7 种在第一个千年就彼此具有接触关系的方言（见图 2）。这个图式虽然也是约定性的，但对一定时期而言（大约第一个千年的中期或略早些时候）还是有可能符合一定历史实际的。然而，用这种符合**语言地理学**原则的图式语言来对传统语言谱系分类进行重新审视还仅仅是个开始。

根据 J. 施密特在波浪理论中针对语言谱系分类已拟定的原则，每一种新的语言现象都以逐渐衰减的一系列波浪从特定的中心不断扩展开去。逐渐发展成亲属语的每一种方言都是这些波浪（同言线）的组合（“束”）。在过渡环节（方言或语言）消失的地方可以发现亲属语言间更加明显的差别。当这些环节存在时，亲属语言（如西罗曼诸语言：法语、普罗旺斯语等）之间的差别是连续不断的，而且它们通过一系列的过渡方言逐渐从一个转换为另一个，这些过渡方言之间最晚近的一些接触使得区分古代与时代较晚的方言联系变得尤为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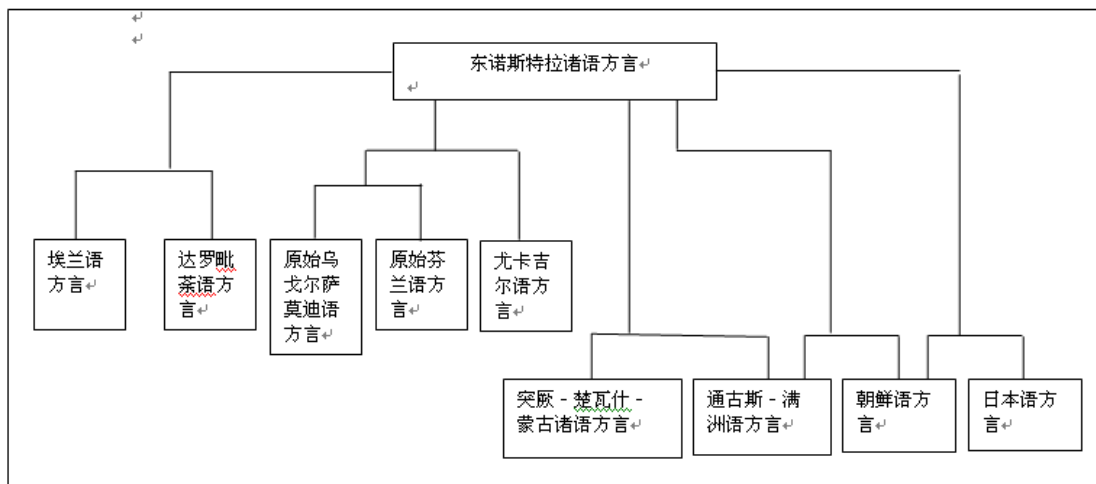
亲属语言分化的历史时间越近，反映这些语言古方言严重割裂状况的古文献数量越多，它们在语言谱系分类中所反映的历史关系图景就可能越切合实际。而如果缺少古代文本，亲

属语言分化的时间又十分久远，它们在语言谱系分类中反映的关系图景的约定性就愈大（如东南亚或南美洲的许多语言就是如此）。



遵循“谱系树”原则的诺斯特拉诸语言分化关系图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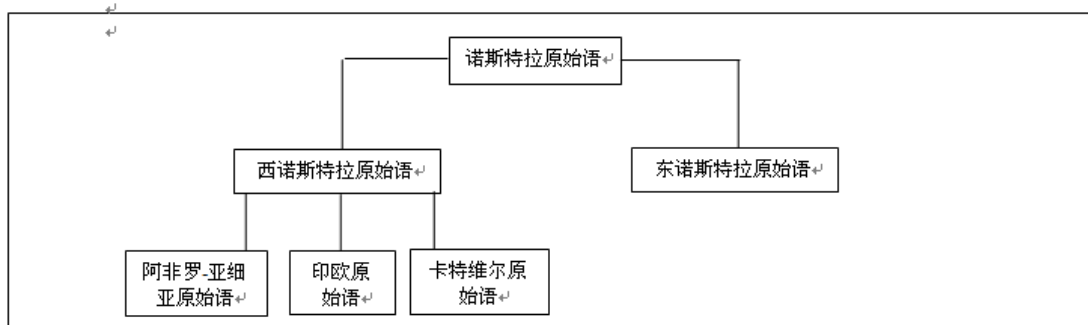
东诺斯特拉诸语言之间的可能方言关系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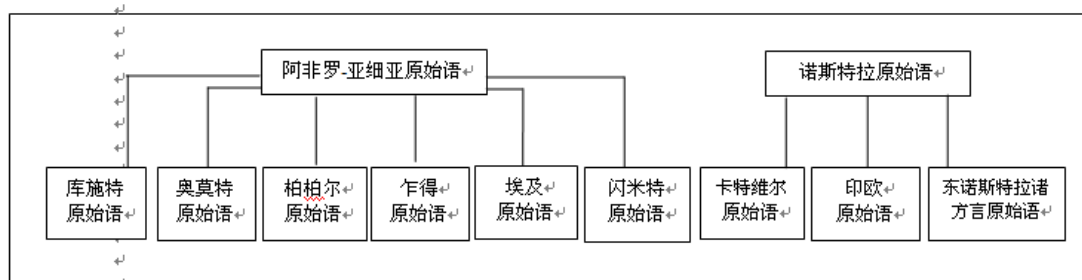
在将距今五千至七千年前分化形成的显而易见的诸语系（如闪语系或印欧语系）统合为更大的“超语系”时，过渡原始语（以及与之相应的语言谱系分类中的次类划分）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所引起的困难会更多，因为“超语系”的形成时间还要早两倍或两倍以上，属于公元前 1 万年后、“新石器革命”前的那个历史时期。对诺斯特拉诸语言（参见**诺斯特拉诸语言**）这样的超语系而言，在发现该超语系之前，语言谱系分类中曾划分出来一些假设过渡阶段语言，所有这些语言有无必要保留是一个问题。如朝鲜语和日语被列入东诺斯特拉诸语言，但暂时尚不能确认，它们是否属于由过渡阿尔泰原始语形成的诸语言之列，或者可以将它们（甚至连同其他隶属阿尔泰语的东诺斯特拉诸语言）直接纳入东诺斯特拉原始语方言（见图 3、图 4）。能否在没有亚非过渡原始语的情况下，认为闪语和其他亚非诸语言（和一系列其他非洲语言，可能还包括同它们有关系的亲属语言）源于西诺斯特拉原始语方言，这也遇到类似的困难（见图 5）；最近有人假设，亚非诸语言组成的是一个特殊的语系，其原

始语与原始诺斯特拉语有亲属关系,但前者并不起源于后者。不排除还有一些过渡方言存在,这些方言使得西诺斯特拉语和东诺斯特拉语之间的差异变得不那么显著。过渡原始语只是某种简化的符号,以便于描写语言谱系分类揭示出来的各种相互关系,不必一定符合某种历史事实。但是鉴于**世界所有语言**可能是单源(共同起源)问题的提出,各个超语系的原始语也可视为过渡原始语(参见**语言单源论**)。系统比较古老超语系的全部构拟原始语可检验语言间古老亲属关系有无存在的可能,尽管从如此久远年代得以保留下来的共同词汇数量有限对比较会有所妨碍。对大多数语系而言,部分在还原的超语系中被观察到的相似词汇可用所比较的全部超语系的假设共同原始语分化后的接触来加以解释。而这又反过来使区分原始亲属词汇成分变得十分困难。所以,时间推得越久远,语言亲属关系程度的确定就越不可靠。由此可见,语言的谱系分类中最可信的应该是关于“新石器革命”后基本语言划分的那些结论。一些否定性质的结论(关于语言间没有亲属关系的结论)可能不完全正确。说支持亲属关系假设的理由极少或许更准确一些(既然对于远古时期语言单源论假说暂时仍然是可能成立的)。虽然谱系分类确定的一些基本的、晚近时期的语系是眉目清晰的,但这还不能保证可以准确地将语系划分为由过渡原始语产生的次类,如果这些语言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分立得足够早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亲属关系有时会非常不可靠)。最后,语言的谱系分类:确定的只是某一基本部分的语法和词汇(词根)形素的起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形素的来源都是已知的。例如,在像日耳曼语和希腊语这样的众所周知的印欧语言中,大部分底层语词汇的起源也只是现在才开始清理厘清,推测它们最终与北高加索语有亲属关系。根据所有上述原因,语言的谱系分类迄今为止仅可以认为是仍处于自身研究的起步阶段。要使语言谱系分类做到真正准确,一方面,要厘清正在发生接触关系的现代方言的区域联系,另一方面,要揭示“超语系”之间更加古老的相互关系。

a) 阿非罗-亚细亚原始语隶属于诺斯特拉原始语



b) 阿非罗-亚细亚原始语与诺斯特拉原始语的并存关系



对于诺斯特拉原始语和阿非罗-亚细亚原始语相互关系的两个观点选项

图 5

在中世纪学者的著作中就已经有一些超前于语言谱系分类理论的个别研究内容,如 M. 卡施加里对突厥诸语言的研究、阿拉伯和犹太语言学家对闪语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等。在 G. W. 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可看到他对之前的语言谱系分类思想进行综合研究的成功尝试。但在确立

印欧诸语言的亲属关系并在 19 世纪初用这些语料、以比较法为基础制定语言谱系分类原则之前, 这些个别研究都不是建立在很可靠的科学考证之上的。虽然早在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已经奠定了语言谱系分类的基础, 但按照施密特波浪理论对语言谱系分类进一步完善的工作是在 20 世纪通过语言地理学成果实现的。20 世纪中叶和后半叶积极地开展了精确研究大多数东南亚、非洲、南北美洲诸语言谱系分类的工作, 将语言统合成“超语系”的系统研究也开始于这一时期。

- Мейе 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метод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языкознании,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54.  
Иванов В. В.,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 и понятие языкового родства, М., 1954.  
Бонфанте Д., Заметки о родстве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К истории постановки вопроса в период с 1200 по 1800 гг., «Вестник истории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1957, № 4.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языков мира, под ред. В. Н. Ярцевой, М., 1980.  
Pisani V., Parente linguistique, «Lingua», 1952, v. 3, № 1.  
Pulgram E., Family tree, wave theory and dialectology, «Orbis», 1953, t. 2, № 1.  
Allen W., Relationship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53», Oxf., 1953.  
Greenberg J., Genetic relationship among languages, в его кн.: Essays in linguistics, [Chi., 1957].  
Penzl H., Zu den Methoden einer neuen germanischen Stammbaumtheori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1986, Bd 108, H. 1, S. 16 - 29.

还可参见世界诸语言词条所附文献。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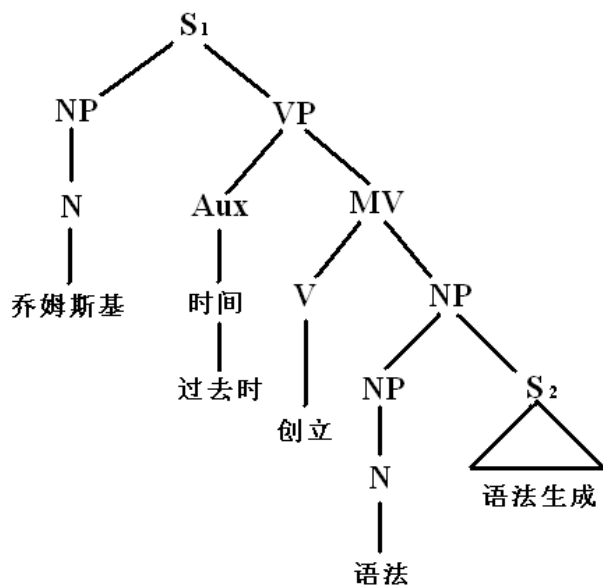
### 生成语言学 (Генера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作者: А. Е. Кибрик; 译者: 易绵竹,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语言学中形式主义方向的一个分支, 在 N. 乔姆斯基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于 20 世纪 50 - 60 年代, 其基础是用特定类型的一些形式模式对语言加以描写。生成语言学初始的、基本的形式模式类型是转换生成语法, 有时简称为转换语法或生成语法。该理论虽然产生于美国, 是美国描写语言学 (参见描写语言学) 和句子直接成分句法分析法 (手段) 的反动, 但其意义所及, 却超出国家的语言学派的范围。生成语言学提出了一些彼此对立的基本概念, 明确区分了“语言能力”, 即语言知识 (competence) 和“语言运用”, 即语言在言语活动中的使用 (performance)。转换生成语法首先描写说话人的语言能力。该语法的结构包括三个基本部分: 句法部分、语义部分和音系 (音位) 部分, 其中核心的部分是句法, 而语义和音系则根据其与句法的关系行使解释功能。转换生成语法引入了句法表达式的两个层面: 深层 (deep, 即所谓深层结构) 和表层 (surface, 即所谓表层结构)。句法描写的任务是演算出所有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确定两者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

句法包括基础和转换两个次部分。基础是假设为各种语言都相近的基本规则系统, 用以演算得出深层结构的有限集, 未来句子的原型。基础的第一个规则  $S=NP+VP$  将句子的起始符 S 分解为前后排列的组成部分: NP——名词短语 (为主语部) 和 VP——动词短语。每个可进一步分解的符号 (即非终端符号) 都可和基础的某个规则相对应, 该规则的左边部分是该符号, 右边部分则指出对该符号可能进行的分解。规则右边部分既可能是非终端符号, 也可能是终端符号 (最终的符号, 不可进一步分解)。词类符号 (V——动词, N——名词, Adj——形容词, Det——冠词等) 就属于终端符号。基础的规则在运用上具有递归性, 可以直到取得一系列终端符号为止, 这些符号的结构特征用直接成分树或括号表示。比如, 为了生成句子“乔姆斯基创立了生成语法”, 可以使用基础规则大体建立以下结构描写图式:





基础规则的结构描写

根据给出的分解式，主语 NP 由名词“乔姆斯基”构成，VP 由包含时间语法范畴的辅助部分(Aux)和主要动词(MV—main verb)构成。主要动词由动词(V)和用作直接宾语的名词短语构成，该名词短语在表层结构中体现为限定组合“生成(的)语法”，而在初始结构描写中则体现为名词短语：名词(“语法”) + 嵌入的(embedded)关系小句 S<sub>2</sub> (“语法生成”)。S<sub>2</sub> 的分解类似母句(matrix) (即主句 S<sub>1</sub>) 的分解。以上结构可用语义部分加以解释(所有的终端符号都要根据生成语法词库词条的搭配限制进行词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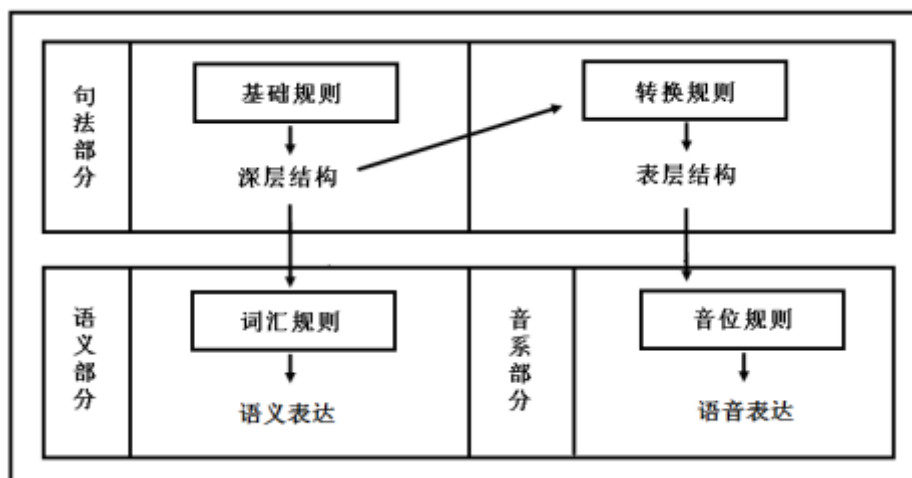
转换次部分生成那些由基础规则运作结果形成的句子表层结构。如果深层结构是一个若干彼此相嵌的句子系列，那么可以循环使用转换规则，从最底层的嵌入句(即不包括任何从句的嵌入句)开始，直到主句为止。

从形式着眼，转换可通过对符号实行四类操作进行：插入、删略(消除)、移位和替代。就内容而言，转换可揭示同义句之间的规律性对应关系，如：(1a)“乔姆斯基创立了生成语法理论”——(1b)“生成语法理论被乔姆斯基所创立”；(2a)“原来，生成语法理论是不正确的”——(2b)“生成语法理论原来是不正确的”等，以及结构和意义上相似的一些构造之间的规律性对应关系，如：(3)“生成语法理论解释语言”——(4a)“生成语法理论努力解释语言”——(4b)“生成语法理论不努力解释语言”——(4c)“生成语法理论努力解释语言吗？”——(4d)“生成语法理论解释语言的努力”——(4e)“努力解释语言的生成语法理论”等。已知有大约 20 种基本转换(过程)，通过这些转换可以得到各种语言的基本句法构造类型，例如：否定转换产生否定句(如 4b)；疑问转换产生疑问句(如 4c)；被动转换可以由 1a 类深层结构产生类似 1b 的句子；称名转换可以将如 4a 的句子变为 4d 类名词短语；关系小句化转换将 4a 类句子变为 4e 类关系小句；将 3 类句嵌入 4a 类句的基础结构并删略同指名词短语，这种转换因同指而删略的是嵌入句的主语；提升转换将 2a 类句的基础结构嵌入 2b 类句，通过提升嵌入句主语至主句结构，从而构成 2b 类句子；反身化转换(在同一个句子中)将同指的名词短语替代为反身代词(如“妈妈给自己买了双手套”)等。

转换次部分之后音系部分“开展工作”，对句子进行语音解释。在音系部分的终端，句子变换为语音符号链(语音特征矩阵的简化表达)。

总体而言，在形式上转换生成语法的规则为： $A=Z/X-Y$ ，亦即若干变换规则，它们表示符号 A 改写为多个符号的序列 Z，其中 X 部分在左，Y 部分在右。转换生成语法的整

体结构可以图示为：



转换生成语法结构图示

20 世纪 60 年代，生成语言学在美国国内外都获得广泛的发展。生成语言学用演算形式描写语言，提高了对语言学描写的显性要求，吸引人们对无法观察、只能间接确定的句法客体给予关注，促进了在详尽程度上可与形态描写手段比美的句法描写手段的形成，将形式化描写技术引入语言学，减轻了包括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处理语言过程在内的许多工作。但是，乔姆斯基的反映所谓“标准理论” (Standard Theory) 阶段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56) 刚出版，生成语言学派内部就已经出现反对派别，如生成语义学、格语法。70 年代，生成语言学的影响大大下降，被揭露出很多弱点，例如提取初始句法成分、基础规则有先验性，未以言语活动模式化为方向，对语义和语用因素的作用估计不足（参见语义学、语用学）、描写不同结构语言的适用性较弱。80 年代，乔姆斯基和他的学生进一步发展了生成语言学的思想（所谓“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等）。这些理论仍然未能克服生成语言学的缺陷。然而，转换生成语法的术语体系已为语言学界广泛接纳，许多并不从事生成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学工作者也在使用这些术语（如深层结构、表层结构、转换等）。

Хомский Н.,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пер. с англ., в кн.: Новое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 2, М., 1962.

Его же, Аспекты теории синтаксиса,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72.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О семантике синтаксиса. (Материалы к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74].

Проблемы порождающе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и семантики. Реферативный сборник, М., 1976.

Демьянков В. З., Англо-русские термины по приклад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и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й переработке текста. Порождающ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в кн.: Тетради новых терминов, в. 23, М., 1979.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енер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в све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чной критики, М., 1980.

Chomsky N., Halle M.,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 Y. — Evanston — L., 1968.

Katz J. J., Fodor J. A., The structure of a semantic theory, «Language», 1963, v. 39.

Bach E., Syntactic theory, N. Y. — [a. o.], 1974.

Chomsky N., Som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 Camb. (Mass.) — L., 198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 元音 (гласные)

(作者: Л. В. Бондарко; 译者: 徐来娣, 南京大学)

音素的一种类型，是根据其发音、声学和功能特征区分出来的。元音的发音特征在于，其发音必须要有嗓音的参与（耳语音除外，这恰恰证实一般规则），而且在喉上腔没有任何阻碍。元音发音有一个特点，肌肉用力不是局限在某个部位，双唇、舌头和软腭在元音音质形成过程中起特别重要的作用。从声学角度来看，元音是有嗓音激励源的、共振峰结构表



现明晰的音素。元音的特殊功能在于，它们是音节峰，是言语音素组合中的成音节音素。元音的所有这些特征都不是绝对的：在元音和某些响辅音之间的发音区别和声学区别可能会完全消失（如俄语词“у Май” [umái]和“май” [ma i̯]中的[i]和[i̯]）。此外，不仅元音可以成为成音节音素，辅音也可以成为成音节音素。因此可以断定，具有上述特征的音素，多半是元音，而不是辅音。元音的唯一一个独特属性是它的更大的成音节能力：在辅音+元音音组中的音节峰必定是元音。元音在行使成音节音素功能时，一方面，好像是在迫使相邻辅音服从自己，因为辅音的发音主要取决于音节中元音的音质；另一方面，元音自身的变化保证了一个词的语音整体性，在这个词里，音节依次排列，其中一个音节带有词重音，而其它音节则是非重读音节；最后，把词联结成语段（语句），也正是依靠重读元音的特殊语音组织作用。因此，元音的语音功能就是把音节、词、语段联结成为一个语音整体。

元音的发音分类基于下列特征：舌头的抬高程度、舌头的前伸或后缩程度、双唇的形状（是否圆唇）、软腭位置。

根据舌头的抬高程度，元音分成3个类别：低元音，发音时舌头在口腔中占据最低位置；高元音，发音时舌头在口腔中占据最高位置；中元音，也就是说，既不属于高元音，也不属于低元音。关于元音根据舌头抬高程度而划分的层级数量，学术界对此没有统一看法：例如，Л. В. 谢尔巴认为，舌头抬起程度除了高位和低位以外，共可以分为4个等级，但是，他也强调说，这样的分类是有条件的。Л. Р. 津德尔则认为，“从‘i’到‘a’……如果舌头缓慢地往下放或往上抬，可以产生一个不间断的元音系列。舌头抬起程度分成3个、4个、6个或7个等级，不过是这个元音系列发音过程中舌位的假设静止点”。

舌头往口腔前部伸还是往口腔后部缩，这就是元音根据舌位前后分类的依据：前元音发音时，整个舌体前伸；后元音发音时，整个舌体后缩；混合位元音发音时，舌头顺着口腔伸直。

圆唇（唇化），也就是元音发音时双唇前伸和圆撮，这是元音最普遍的特征之一。

根据软腭位置，元音分为口腔元音（软腭上抬，通往鼻腔的气流通道关闭）和鼻元音（软腭下垂，气流通过鼻腔）。

咽音化是元音的一个不太普遍的特征——在发音时咽壁收缩。

除了发音特征以外，在描写元音时，还要考虑到它们的韵律（просодия, prosody）特征，首先是音长和音高，因为有的语言中元音根据音长或音高特征在音位上对立。长元音和与其对应的短元音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发音时间更长，而且还有一些发音特征上的区别（如英语[i:]比[i]开口度小，舌位靠前；德语[u]比[u:]开口度大，舌位较前，等等）。长元音和短元音之间的音长差异可以有不同表现：如果长元音和短元音在音质上没有区别，那么它们之间的音长差异最为明显；如果长元音和短元音在舌位前后、舌位高低等方面有区别，那么它们之间的音长差异最不明显。根据音高所进行的元音分类，不仅要关注声带振动的频率特征，而且还要关注一些更为复杂的特征——如频率变化的速度、音区、变化发生所用时间，等等。从发音的音质同一性角度出发，元音可以分成**单元音**和**双元音**。

元音的声学特征，取决于那些起共鸣腔作用的喉上腔的特性。每个共鸣腔的共振频率取决于共鸣腔的体积和形状，也就是说，取决于舌位、唇形等。这些共振频率通常叫作元音的共振峰。在描写元音的声学特征时，通常要考虑到前两个共振峰（ $F_1$  和  $F_2$ ）的特性，众所周知， $F_1$  和  $F_2$  的频率在一定程度上与元音的发音特征相关： $F_1$  的频率取决于元音的舌位高低（元音开口度越大， $F_1$  的频率就越高），而  $F_2$  取决于元音的舌位前后（元音舌位越前， $F_2$  的频率就越高）；元音的唇化会降低两个共振峰的频率，元音的鼻音化会导致  $F_1$  和  $F_2$  强度的减弱，同时还会导致补充的“鼻音共振峰”的出现。可以推测，对于  $F_2$  频率高的元音来说（即对于前元音来说），重要的还有更高的共振峰  $F_3$  的频率特征。共振峰频率特征在时间上的变化可以证明元音在发音上的变化。

元音的声学分类，不仅取决于共振峰频率特征本身，而且还取决于那些用来描写元音频谱上共振峰分布情况的更为复杂的特征。根据基本能量集中于元音频谱上哪个区域（是高的区域还是低的区域），元音分为高元音和低元音；根据元音频谱上中心区域共振峰分布的情况，元音分为紧实元音（компактный, compact）（共振峰集中于元音频谱中间区域）和散元音（диффузный, diffuse）（共振峰分布在元音频谱两侧）；根据元音共振峰分布情况相对于中立元音共振峰分布情况的偏离程度，元音分为紧元音（напряженный, tense）（距离较大）和松元音（ненапряженный, lax 或 non-tense）（距离较小）。

元音在其感知时所用到的特征极为重要。由于在元音的共振峰频率和元音的发音学阐释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要研究不同的声学特征对于元音音位识别的作用。已确定，在元音发音过程中共振峰频率的变化，不仅可以被人用来识别元音本身，还可以用来识别相邻辅音（通常是前一个辅音）。对于确定元音舌位前后或者舌位高低这一类特征，最主要的是某一个共振峰的一些临界值。

一个语言、一个方言或一组语言中的元音体系叫作**元音系统**。

**描写世界语言的各种元音时采用的基本术语**（用星号标注的术语，用来表示元音在构建表意单位时的功用）。

\* 隐现元音——只在语素中特定语音位置上出现的元音，它们在语素的其它位置上不可能出现，如俄语的词根元音，出现的原因是历史上弱位中的弱化元音脱落（сон — сна, день — дня），再如俄语 молоток — молотка, колодец — колодца 一类名词中的后缀元音等。

高（舌位）元音（闭元音、窄元音）——发音时舌头在口腔中处于高位的元音。通常还可区分不同的元音体系，其中，术语“闭元音”、“窄元音”可用来表示舌位与“开元音”、“宽元音”相对立的元音，但是从普通语音学视角来看，“闭元音”、“窄元音”属于同一高度（如[e] - [ɛ], [θ] - [œ]）。

高元音——1) 声学特性与  $F_2$ ,  $F_3$  频率相关的元音。从发音角度来讲，高元音是指前元音，其特点是  $F_2$ ,  $F_3$  的频率数值高；2) 也就是指**高舌位元音**。

清元音——发音时没有嗓音参与的元音，如元音在清辅音之间发生明显弱化时；耳语音。

散元音——这样一类元音，其共振峰不是集中在元音频谱中间区域，而是分散在元音频谱两侧，如[i]是一个散高元音，[u]是一个散低元音。散元音与紧实元音相对立。

长元音——与其它元音相比长度大的元音。如果音长是元音的音位特征，根据音长特征长元音与相应的短元音对立（如英语、德语），那么，长短元音之间的音长差异往往还伴随着音质差异（如英语长元音[i:]开口度较小，舌位较前，而[i]开口度较大，舌位较后）。在语素结合部位，两个相同音质的元音组合，结果同样会产生长元音，此时，这些元音最好称之为双元音（试比较：俄语“**фамилии**”）。

后位元音（后元音、软腭元音）——这些元音的发音特点是舌体后缩。

紧实元音——以共振峰分布集中于元音频谱中部为特点的元音，（如俄语元音[a]）。紧实元音与散元音相对立。

短元音——1) 与长元音相对立的元音；2) 音长较短的元音，但是这个特征与音位系统无关（如俄语词重读音节前第二个音节中，可以观察到元音音长明显缩短）。

鼻元音——由于相邻鼻音的协同发音作用，发音时软腭下垂的一类元音。在总体发音松弛时，没有鼻音的作用也可能会发生鼻音化现象（如在词发音完全结束时，由于要为声道的静止状态做好准备，软腭可能会下垂）。

紧元音（强元音、非弱化元音）——1) 发音高度紧张（肌肉明显紧缩，导致声道组织弹力加大）的元音。例如，法语元音比俄语元音紧张度更高，俄语重读元音比非重读元音紧张度更高；2) 这样一类元音，其共振峰结构比松元音更加明显地有别于中立元音的共振峰结构。

中立元音——1) 舌头顺着口腔伸直而发出的元音；舌头放在中间高度构成中立元音，也叫作舌面元音，如英语的[ə]，有时这样的元音也叫作中元音；2) 指短促的松元音，其音质不确定，通常在非重读音节中出现（如俄语的[рѣтлѡк]）；3) 类似元音的音素，是发音器官处在和静止时相同的状态下发出的。

松元音——（弱化元音、弱元音）与紧元音相对立的元音。

非成节元音——不能构成音节的元音（试比较滑音）。

非固定元音——（非均质元音）发音过程中共振峰频率数值有变化的元音（而且与发音动作有变化相对应）。这些变化有可能涉及元音的部分发音阶段（元音的起始发音阶段和结束发音阶段），在元音音长较短时，则涉及整个元音（如非重读元音在发生量的弱化时）。

低（舌位）元音（开元音、宽元音）——以舌位低因而开口度大为发音特点的元音。有时术语“开元音”和“宽元音”用来表示同样舌位高度的对立元音音位的音质（试比较术语“闭元音”、“窄元音”）。

低元音——这样一类元音，其频谱上的共振峰分布特点是，主要能量集中于频谱下部（如元音[u]）。

鼻元音——软腭下垂，使得鼻腔起到补充共鸣腔作用时而发出的元音；鼻元音的特点是出现“鼻腔共振峰”，而且所有共振峰的频率都减弱和降低。

\* 零位元音——在分析时被作为功能单位构拟出来的、而在语音上并没有被体现出来的元音（如俄语零位词尾 дом, конь）。

圆唇元音（唇化元音、唇元音）——双唇圆撮并前伸而发出的元音（如俄语的[o], [u], 法语中的[y], [ø], 英语中的[ɔ], [o:]）。

后移元音——这样一类前元音，发音时由于受到语音构成的普遍语音规律的影响，舌位略微后移（如俄语的元音[i]和[e]，两者都是前元音，但是[e]和[i]相比较，舌位略微后移），或者由于受到周围语音的影响，舌位略微后移（如前元音在后舌辅音之间舌位后移）。

前位元音（前元音）——发音时舌头伸到口腔前部的元音。

前移元音——发音时舌位略微前移的后元音，这可能是由语言整个语音系统所特有的发音方式所决定的，也可能是由于受到周围语音的影响。如俄语元音[a]是一个后元音，但它是一个前移的后元音；俄语元音[u]是一个圆唇的高舌位后元音，在两个舌尖辅音之间的非重读音节中，舌位明显前移：судá, зудéть, дура́чить 等。

\* 前增元音——由于某些原因，词首的初始语音组合难以发音，因而在词开头增添的元音（如法语词首音[e]，出现在那些拉丁文中以辅音组合起首的词中：spathula (m) >épaule, scutu (m) >écu 等）。

口腔元音（纯元音、单纯元音）——软腭抬起从而排除鼻腔参与发音的元音。

超短元音——1) 由于量的弱化显著而音长很短的元音，如 самовáр, потоло́к 重音前第二音节中元音的莫斯科俄语标准发音；2) 在音长是区别特征的音位系统中，与短元音、长元音在音位上相对立的元音。

合成元音——类似于元音的合成语音，它们是用专门装置——语音合成器把某个元音所特有的频率组元合成起来而获得的。语音合成器使得实验者可以操控这些元音的各种特性，也就是说，随意改变这些特性，以便显示这样或那样特征（音长、音强、共振峰频率状况）的语音感知值。

中（舌位）元音——在发音上中（舌位）元音的特点是，舌头相对于硬腭的位置可以说在相对中间，也就是说既不高，也不低。

央元音（中间位元音、舌面元音）——1) 在发音上既不是前元音、又不是后元音的元音。其中包括中间位元音，它们是舌头顺着口腔伸直而形成的，还包括中元音，它们是在舌头缩成一团、位于口腔中部时形成的；2) 央元音有时也用来指前移的后元音（这是错误的！）

(如俄语[a]), 以及从发音开始到发音结束舌位发生前后变化的元音(如俄语[ы])。

固定元音(均质元音)——在整个发音过程中共振峰频率值固定不变的元音。从发音角度来看,也就是在元音发音时,言语器官的状态自始至终固定不变。

\* 紧缩元音——由于两个属于不同语素的元音发生紧缩而产生的元音(如俄语наобум)。

\* 连接元音——词干中的最后一个元音,用来将词干与词尾、不定式后缀连接起来。

\* 变音元音(умлаутированный гласный)——在带有前元音或者中舌辅音的相邻语素影响下,非前元音被前元音替换产生的元音。

咽化元音——发音时带有咽喉壁紧缩这一附加动作的元音。

韵腹(централи, central)(韵腹元音)是指音节语言中音节的构成成分,在功能方面属于韵母,而在语音方面是成音节音。

Зиндер Л. Р., Общая фонетика, М., 1979.

Щерба Л. В., Рус. гласные в качеств. и количеств. отношении, Л., 1983.

Jassem W., Podstawy fonetyki akustycznej, Warsz., 1973.

(田文琪、张家骅 审校)

### 洪堡特主义(Гумбольдтианство)

(作者: В. И. Постовалова, Г. В. Рамишвили; 译者: 杨明天, 上海外国语大学)

普通语言学 and 语言哲学奠基人 W. 洪堡特有关语言及其研究方法的一系列观点的总和,这些观点形成于他的哲学 - 语言学纲领之中。研究语言的人类学取向是这一纲领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根据这一研究取向,对语言的正确的研究应当与人的意识和思维、文化和精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洪堡特语言学思想的出现是对 17 - 18 世纪反历史主义和机械主义语言观以及逻辑主义和普遍主义思想(参见逻辑主义流派, 普遍语法)的反动;这种语言学观的依据是 J. 赫尔德关于语言的性质和起源以及语言、思维和“民族精神”相互关系的思想,还有 F. 施莱格勒和 A.W. 施莱格勒的语言的类型学(形态学)分类思想。洪堡特的哲学观点在德国古典哲学思想(I. 康德、J.W. 歌德、G. W. F. 黑格尔、F. 席勒、F.W. 谢林、F. H. 雅可比等)的影响之下形成,他的思想是哲学人类学(20 世纪上半叶西欧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一个流派)的源头之一。

根据洪堡特的观点,语言是人的精神生气蓬勃的活动,是民族的一致能量,源自人的内心深处并贯穿其全部生活之中。语言不是已经做成的事情或东西(Ergon),而是一种活动(Energieia)。其中所积聚的不是精神生活的结果,而是这种生活的本身。语言的真的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语言是人的精神最为重要的活动,是人的所有其他类别活动的基础。语言是使得人成为人的力量。根据洪堡特的观点,语言是初始语言能力的一种反映,这种初始语言能力以某些可以模糊意识得到的活动原则形式存在于人身上,并借助说话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实际化。人在唤醒自身语言能力、语言交际过程中展现这种能力的同时,每次都通过自己本身的努力,自我创造语言。语言不是僵死的制品(Erzeugtes),而是创造的过程,是一种生成(Erzeugung)。

根据洪堡特的观点,语言的生成是将概念与声音熔为一体的综合过程,它变声音为鲜活的思想表达。综合包括两个逻辑上有先后关系,而事实上是同时关系的方面:1)对声音和思想的无形实体进行切分,形成发出的声音和语言概念;2)把它们连接为统一的整体,使之彼此完全渗透。

与语言的综合和生成概念紧密关联的是语言形式的概念,洪堡特把语言形式理解为借助声音表达思想的精神创造活动中的恒常、同形元素,这些元素集其全部联系和系统性于一身。语言的形式,根据洪堡特的观点,是诸多语言成素个体的综合,它们在精神上的一致。每种语

言的形式与使用该语言民族的精神天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不可复制的独特构成物，尽管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形式对所有语言而言仍是相同的。洪堡特区分“语言的内部形式”(innere Sprachform)和“语言的外部形式”(声音、语法等方面)。“语言的内部形式”作为语言生成的深层原则，确定着语言组织的所有特殊性；“语言的外部形式”表现、体现内部形式，但外部形式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却都不固定地表达后者。

根据洪堡特的观点，语言的用途在于：1) 实现“把世界转变为思想”，2) 充当人们相互理解过程的中介和他们思想、情感的表达工具，3) 是发展人的内部力量的手段，给予说话人思维力、情感力和世界观以刺激作用。根据洪堡特的观点，语言是构成思想的器官；思维并不仅仅是一般地受制于语言，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每一种具体语言所制约；各种语言是各个民族独特的思维器官。

洪堡特阐释的语言并不是世界的直接反映。语言中实施的是人对世界的阐释行为。根据洪堡特的观点，各种不同的语言是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它们不是同一东西的不同称名，而是给出这个东西的不同视像。词不是事物自身的印迹，而是对于事物的感觉形象的印迹，这个感觉形象是该事物经过语言创造过程在我们心灵中形成的结果。词并不和事物本身，甚至感知事物等价，而是和语言创造行为中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等价。任何语言在表示各个事物时，实际上是在进行创造；语言为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形成一幅世界的图景。根据洪堡特的观点，每一种语言在它所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只有跨入另一道樊篱，才有可能摆脱母语的樊篱。语言作为世界观的体系，给予人的行为以调节作用：人按照语言将事物提供给他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事物。

洪堡特所理解的语言是一个“紧张”的、充满活力的整体，由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各种彼此对立、相互依存的因素构成。洪堡特(根据 H. 施坦塔尔、A. A. 波铁布尼亚、П. A. 弗洛连斯基和 A. Ф. 洛谢夫的阐释)在语言中区分出以下几组二律背反：活动 / 事物性(活性 / 物性)、个体 / 民族(个人 / 集体)、自由 / 必然、言语 / 理解、**言语** / 语言、语言 / 思维(人的精神)、固定 / 活动、规律性 / 自发性、暂时 / 泛时、连续 / 离散、客观 / 主观。

洪堡特纲领的理论、方法论基础的特点是：1) 把研究语言和人的自然主义原则、活动原则相结合——把语言同时解释为精神的机体及其主动性，或者活动、精神的语言；2) 辩证的取向(对语言性质的二律背反解释)；3) 把语言看作系统和整体的观点；4) 动态的、过程的、发生学的视角优先于结构、静态方面的语言描写；5) 把语言视作生成自身的机体；6) 对语言的泛时观点优先于在具体历史时期对语言运动进行历史分析；7) 鲜活言语的研究优先于语言机体的描写；8) 对现实存在语言生动活泼的多样性的兴趣与对作为人类普遍财富的的语言的兴趣，二者要结合起来；努力按照理想的方式，把诸语言作为通向语言自身完善结构的各级阶梯来加以体现；9) 不只局限在语言自身内部描写语言，要把语言和人的其它精神活动类型进行对比，首先要和艺术进行对比；10) 以抽象的哲学观点观察语言和用高度精密的科学取向研究语言相结合。(B. И. Постовалова)

洪堡特主义在德国，而后在俄国得到了发展。洪堡特主义的心理学(最长久的)传统起始于施坦塔尔出版洪堡特语言哲学著作选集，他给这些著作做了许多注释。施坦塔尔将工作转向洪堡特权威著作意在构建一门新的学科——《民族心理学》。洪堡特的“精神”(Geist)、“民族精神”概念，经施坦塔尔依照当时经验主义心理学的个人主义取向阐释，改变为言说个体的“心理”(Seele)，失去了民族社会学的维度。19世纪下半叶，在实证主义的、印欧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洪堡特的名字基本上只在研究语言分类的著作中被提及。

洪堡特提出的“语言的内部形式”概念有多种解释，可以这些解释为例对洪堡特主义的演变进行跟踪考察。德国曾存在几个方向的解释：心理学方向认为，语言的内部形式是决定它的外部形式的心理过程(施坦塔尔, W. 冯特)；逻辑-现象学方向把“纯粹”意义的逻辑

形式和内部形式等同起来，确认说话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相应地通过语言手段，复现具有普遍性质的“理念的”意义（E.胡塞尔）；一些学者认为，语言的内部形式还涉及具体语言的句法层面，是评价一切在本语言中得到思考和言说的内容的关键（L.魏斯格贝尔）。

俄国对洪堡特遗产的思考始自 П.比利亚尔斯基把洪堡特的主要著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59）翻译为俄语。波铁布尼亚促进了洪堡特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思想和语言》，1862，等等），虽然他对这些思想的解释，并未摆脱施坦塔尔心理主义的影响。洪堡特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与在莫斯科出版的 Г. 什佩特的著作《词的内部形式》（1927）相关，这是从胡塞尔现象学和逻辑学角度对施坦塔尔、波铁布尼亚的心理主义所作的反驳。

根据洪堡特的观点，比较语言研究是主要的语言学科，它根本有别于比较语言学，后者的目的是借助历史比较的方法，证明一个语系内诸语言的谱系亲缘关系（参见**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有别于寻求普遍现象的语言类型学以及现代理解的“深层结构”的研究（参见**深层结构**）。所谓“普遍的东西”，作为洪堡特及其直接追随者的比较语言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不是抽象的图式，也不是“一般而言的语言”，或是介于语言和思维之间的什么东西，而是把世界转变为思想的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虽然语言能力的普遍属性囊括全人类（根据洪堡特的观点，也是把人类聚合为一体的内在因素），但是，这种能力并不体现在一个全人类的普遍语言中，而是以多种面貌体现在各种各样的语言中。每一种语言就其单独而言，应当被看作“满足这一内在需求而进行的一种尝试，而全部语言，就应看作这样一些尝试的总和”。由此可以得出（比较）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仔细考察各种不同的语言途径，无数民族都在通过这些语言途径解决全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共同问题。根据洪堡特的观点，“不同途径”不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语音标记，而是该事物的语言“视像”形成的不同方式：“在形形色色的语言中产生的诸多概念，如不借助语言，仅凭单纯的理性本身是永远也不可能构成的”。正是洪堡特所理解的比较语言研究，揭示了“在哲学上加以论证的语言比较”的实质。

（亦可参见**新洪堡特主义**）

- Гайм Р., Вильгельм фон Гумбольдт, пер. с нем., М., 1898.  
Потебня А. А., Мысль и язык, 3 изд., Харьков, 1913.  
Шпет Г. Г., 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 слова. (Этюды и вариации на темы Гумбольдта), [М.], 1927.  
Амирова Т. А., Ольховиков Б. А.,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Ю. 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гл. «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 в XIX в.»), М., 1975.  
Постовалова В. И., Язык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пыт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 Гумбольдта. М., 1982.  
Кильен Ж., Культура (Bildung) и разум у В. фон Гумбольдта, в кн.: Разум и культура. Труд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франко-советского colloквиума, [М.], 1983.  
Гумбольдт В. фо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пер. с нем., М., 1984.  
его же, Язык и философия культуры, пер. с нем., М., 1985.  
Звегинцев В. А., О научном наследии Вильгельма фон Гумбольдта, в кн.: Гумбольдт В. фо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М., 1984.  
Рашишвили Г. В., Вильгельм фон Гумбольдт —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там же.  
его же, От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 кн.: Гумбольдт В. фон, Язык и философия культуры, М., 1985.  
Кацнельсон С. Д.,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Вильгельма Гумбольдта, в кн.: Понимание историзма и развития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 1-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Л., 1984  
Гульга А. В., Немец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М., 1986.  
Humboldt W. von: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von A. Leitzmann, Bd 1—17, B., 1903—36, B., 1968.  
Werke, hrsg. von A. Flitner und K. Giel, Bd 1—4, Darmstadt — B., 1960—64.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 Schiller und W. von Humboldt, hrsg. von S. Seidel, Bd 1—2, B., 1962.  
Weisgerber L., Zweimal Sprache, Düsseldorf, [1973].  
Scuria H., W. von Humboldt. Werden und Wirken, 2 Aufl., B., 1975.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 方言学（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作者：V. V. Иванов；译者：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地方的、地域性的语言变体，即**方言**。方言学有两个分支：描

写方言学，研究语言与研究者同时的地方变体；历史方言学，研究该语言历史上的方言发展。

描写方言学调查分布在这样或那样的方言地方变体中、使这些变体相互区别的语音、语法、词汇特征，以研究各种地域方言的语言特点。在划分方言的时候，还要考虑语言外的社会 - 历史因素（物质及精神文化成分、文化 - 历史传统等）。方言差别使一些地域联合在一起，而使另外一些地域相互区分开来。总和特定的一些差别，能够划分出一种语言的若干独立方言，方言之间构成对立的关系。但是，方言差别总和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因为方言切分是多层级的：语言总体特征相近的方言被整合在更大的方言群中，但由于另外的一些总体特征，它们可能分成更小的单位。因此在方言学中，与方言概念一起存在的还有方言地方变体总称（наречие）、方言带、地方话（方言地方变体）（говор）这样一些概念。

由于方言是语言的无文字形式，方言学对它们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直接观察法开展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时，语言特点的信息采集通过征求语言通晓者（教师、农村知识分子等）的书面回答来进行，这些人要回答专门编制的调查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涉及方言的不同语言层面，可用来做数据的比较研究。使用直接观察法时，方言学者根据事先制定好的问卷大纲，记录方言使用者的鲜活言语，记录下来的（特别是记录在磁带上的）鲜活言语可用来详细分析该方言的语言特点。

历史方言学的目的在于重构方言的历史，方言特点产生、演进或消失的历史，方言在特定地域的扩散或扩散范围收窄的历史，最终通过对特定语言各种方言变体的研究，致力重构该语言的存在与发展的全部历史。现代方言和过去不同时期的古文献都可作为研究方言历史的资料来源，文献作者的鲜活言语在文献中得到反映。历史方言学者研究现代方言时（特别是在该方言地域没有出土古代文献的情况下）采用回溯的方法：因为在各种方言的语言系统中（就像一般地在语言中那样）共存着不同时期产生的成分，通过内部重构法可以揭示这些历史沉积层，复制各种方言的以往状态及其系统的演进轨迹。如果存在古代文献（特别是特定地域的文献），就可以使用直接法研究现今的方言特点在文献中的反映（由于受到文牍人员所操地方话的影响，这些反映表现为对传统正字法的偏离），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确定方言特征出现的绝对年代顺序，据此对该方言的演进展开从古至今的循序研究。如果研究方言历史既有古代文献依据，又有现代资料参照，那么历史方言学就会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

方言学与语言的历史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方言保留了大量标准语中已经消失的语言现象，或者方言衍生了标准语中不曾衍生、或在标准语中朝另一个方向衍生的语言特征。方言学还与语言使用者的民族历史联系在一起，因为方言常常是了解过去不同地域居民之间联系、不同语言和方言使用者接近与疏离过程、移民和迁徙活动的唯一知识来源。最后，方言学与民族学相关联，因为许多民族学和方言学特点在总体上决定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地域。

作为一门科学，方言学的产生与人们对民间活的言语的兴趣发展相关。17 世纪末，德国开始收集德语民间地方话资料，编纂地方词汇札记及方言词语词典。19 世纪下半叶，青年语法学派的出现促进了地域方言的科学研究，方言开始被看作是语言自然发展的产物，是语言在不同的扩展地域有规律的体系变异。方言学研究在德国（J.A.施梅勒）、法国（G.帕里斯、J.吉列龙）、意大利（G.I.阿斯科利）广泛开展。

俄罗斯方言学发端于 18 世纪，M. B.罗蒙诺索夫首先划分了三个“主要的俄罗斯方言”——莫斯科方言、北方方言和乌克兰方言，其中的莫斯科方言被看作是主要的一个。从 19 世纪初起，俄罗斯展开收集方言材料的工作，成果发表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作品》中；后来，俄罗斯地理协会也做了同样的工作。1852 年，在 A.X.沃斯托科夫和 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共同努力下出版了《大俄罗斯方言词典试编》，1858 年出版了该词典的《增补本》。1852 年 B.И.达里在以《试编》为缘起的《论俄语方言》一文中给予大俄罗斯语方言以扼要的阐述。在俄罗斯方言学的发展中，达里的《活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1863 - 1866）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这部词典收录了许多方言词汇。此后，俄罗斯方言学在 A.A.波铁布尼亚的

著作中得到继续发展，波铁布尼亚主要关注的是描写和阐释俄语方言中具体语音现象的起源。

19 世纪末 - 20 世纪初，方言学领域中的标志性成果是 А. И. 索博列夫斯基和 А. А. 沙赫玛托夫的著作。索博列夫斯基收集并系统分析当时俄罗斯方言学的所有成果，撰写了《俄语方言学探索》(1897)，正是他首先使方言学教程成为大学教育课程。沙赫玛托夫编制了收集各种俄语地方话资料的大纲，广泛采用方言学数据来说明俄语发展的不同历史进程。他还与 Л. Л. 瓦西里耶夫合作确定了俄语方言中“а 音化”的基本类型，对这一现象的来源提出了解释方案。“а 音化”的类型学问题由 Н. Н. 杜尔诺沃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大俄罗斯语地方话的方言学探索》第 1 卷第 1 册, 1917; 第 2 卷, 1918)。沙赫玛托夫对俄语基本方言的分类被莫斯科方言协会接受并加以发展(1903 - 1931)，该协会发布了两个采集方言信息的大纲(1909, 1911)，并于 1915 年出版了《欧洲俄语方言地图试编附俄语方言学概要》(杜尔诺沃、Н. Н. 索科洛夫、Д. Н. 乌沙阔夫)。

1917 十月革命后，针对俄语方言开展的方言学研究迅猛发展。在 20 - 30 年代从事方言学研究的有 Е. Ф. 卡尔斯基、Н. М. 卡林斯基、А. М. 谢利谢夫、В. И. 切尔内舍夫、И. Г. 果兰诺夫。30 年代研究方言学的有 Р. И. 阿瓦涅索夫、А. Н. 格沃兹杰夫、Н. П. 格林科娃、П. С. 库兹涅佐夫、Б. А. 拉林、В. Н. 西德洛夫、Ф. П. 费林等。自 40 年代起，方言资料、俄语方言语言体系不同侧面的研究成果大规模出版，方言的各种实验法研究发展起来(С. С. 维索特斯基)，俄语历史方言学的研究工作也在展开(阿瓦涅索夫、费林)。

40 年代下半期开始，收集方言材料绘制俄语方言地图的工作开展起来(参见方言地图)。苏联科学院、众多大学和师范学院按照专门的大纲对苏联欧洲部分的俄语方言地方变体展开了全面调查，使得大量过去不为人知的方言现象得以揭示，为很多理论工作奠定了基础。方言学问题研究是以苏联多民族语言材料为对象开展的，其中发展尤为迅速的是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摩尔多瓦语、立陶宛语、乌兹别克语的方言学。

从 60 年代起，方言词典编纂领域取得十分突出的成就：苏联不同地域方言的大批词典问世，从 1965 年开始出版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编纂的总结性《俄语民间地方话词典》，一个专门研究方言词汇的领域——方言词典学形成了。

19 世纪末，不同语言的方言材料积累以及将它们搬上地图的工作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它脱胎于方言学，被人们称作语言地理学。20 世纪苏联和国外的方言学发展都是和语言地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和研究地域方言的方言学相区分的是社会方言学，社会方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在社会阶层、年龄、职业上的分化现象。社会方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它研究社会习惯语、黑话，它们与民族语言其他变体的不同之处表现在词汇、熟语和语义方面。社会方言在语音、语法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Аванесов Р. И.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 ч. 1, М., 1949.

Его же, Описательн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и история языка, в кн.: Славя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Докла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V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ъезд славистов, М., 1963.

Его же, О двух аспектах предмета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 в кн.: Общеславян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1965.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Немецк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М. — Л., 1956.

Нарысы па беларускай дыялекталогіі, пад рэд. Р. І. Аванесова, Мінск, 1964.

Русск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под ред. Р. И. Аванесова и В. Г. Орловой, 2 изд., М., 1965.

Жилко Ф. Т., Нариси з діалектологі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мови, 2 вид., Київ, 1966.

Йордан Й., Ром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пер. с рум., М., 1971.

Bach A., Deutsche Mundartforschung, 2 Aufl., Hdlb., 1950.

Pop S., La dialectologie, pt. 1—2, Louvain, [1950].

Ivić P., Structure and typology of dialectal differentiation, в кн.: Proceedings of the IX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ics, The Hague — [a. o.], 1964.

Zamora Vicente A., Dialectolog í española, 2 ed., Madrid, 1979.

另参见语言地理学参考文献。



## 加岱诸语言 (Кадай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 Н. В. Солнцева; 译者: 许高渝, 浙江大学)

处于台诸语(参见台诸语言)和南岛诸语(参见南岛诸语言)中间状态的一组语言,包括拉嘉(普标,或称卡标)语、仡佬(克佬,稿)语、拉缜语和黎语。在谱系分类中的地位尚未最终确定。P. K. 本尼迪克特(白保罗)将其确定为独立的一组, A. - G. 奥德里库尔把拉哈语和拉珈语也补加其中。中国学者将仡佬语归入汉藏语系,但指出仡佬语同壮、台诸语以及侗-水诸语最为接近,而同黎语差别最大。中国学者将拉珈语归为汉藏语系中的侗-水语支。许多苏联学者(雅洪托夫等)将加岱语、台语、侗-水语合成一组,称为泛台诸语言。加岱语通行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部,主要分布于山区。使用该语言的人数资料不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讲普标语的人数约为25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普标语的人数未知),操拉哈语的有1500人(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79年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仡佬族有5.5万人,但该族大部分人不会说仡佬语。

加岱语属孤立语。大部分加岱语的词素界限通常和音节界限吻合。凡偏离该规律时,说明某语言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同时显示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在语音、音位层面和形态层面有区别。加岱语中的简单词或简单词素主要由强音节来体现,也有可能是强音节和弱音节的组合(如普标语,拉哈语中这种情况较少,仡佬语实际上没有这种情况)。强音节的结构是CVC(辅音+元音+辅音)或 $C_1C_2VC_3$ (辅音<sub>1</sub>+辅音<sub>2</sub>+元音+辅音<sub>3</sub>)。强音节始终带有声调,是重音节,处于词尾位。弱音节的结构为CV(辅音+元音),始终为非重音节,处于强音节前。普标语的弱音节声调“中立”,平调,中度音高,拉哈语弱音节的声调与其语源强音节声调相同。辅音系统由简单音位和音丛组成。辅音丛在普标语和拉哈语中是两个音位,在仡佬语中是被若干补充发音特征繁化的一个音位。普标语、仡佬语和拉哈语可能处于声母位的简单辅音位达26个,音丛达23个(ph, pw, tsh, mn, kl等)。韵母位的辅音系统各不相同;仡佬语可能的辅音韵尾只有一个 /n/ 和零辅音韵尾),拉哈语和普标语可能的辅音韵尾有9个(/p/, /t/, /k/ 等)和零辅音韵尾。普标语、仡佬语和拉哈语的元音系统由10 - 25个单元音和4 - 8个二合元音组成。普标语的二合元音可由高元音构成,拉哈语中,二合元音仅在越南语或泰语借词中出现,仡佬语的部份二合元音仅同汉语借词相关。普标语中的所有元音(/y/ 除外)均有长短的区分,拉哈语只有央元音。普标语有5种声调,仡佬语和拉哈语有6种。在词类系统中,动词和形容词与名词、代词、数词相对立。所有的词类除副词外都有具体的语法范畴:名词和人称代词有数范畴,动词和形容词有体、时和态(被动态、使役态)。数词有4种形式:事物计数词、顺序计数词、抽象计数词、事物-顺序计数词。这些范畴的标记一部分是原来固有的,一部分是从越南语、汉语和泰语借用的。

词际句法关系通过词序、虚词和语调来表示。词序相对固定:带及物动词的词序可能有SVO和OSV两种,带不及物动词的词序则为SV和VS。直接宾语不借助借词引进,间接宾语通过介词引进,间接宾语的位置相对自由。仡佬语中可通过借自汉语的虚词“把”将直接宾语倒装。加岱语有简单句和复合句(有连接词的和无连接词的)、单部句和双部句。双部句区分为动词句、性质句和系词句)。句子还可按说话的目的来分类。

构词手段中有重叠法、词缀法和复合法。构词模式因词类的不同而不同,如全部语音构成重叠用于体词构形,改变语音构成重叠可用于形容词的构词和构形。第二种重叠可能是辅音重叠和叠韵。派生词可借助新的词缀和半词缀以及旧的词缀构成。旧词缀(如普标语中和拉哈语的一些词中借助ka-, po'-, mo'-; 仡佬语借助lu-, ge-, qau-)通用于该地域的南亚诸语言和南岛诸语言,在加岱诸语言中主要见于构词领域。

在基本词汇中除了固有词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与其他语言(台诸语言、汉语、南岛诸语

言和南亚诸语言)共有的词。如普标语中与台诸语相同的词达30%，与拉哈语和台诸语都相同的词达25%，和南岛诸语相同的有7%，其中包括与拉哈语、台诸语都相同的。普标语、拉哈语和台诸语的共有词就语音外壳而言，普标语和拉哈语一般比台诸语更加古老(普标语和拉哈语的词为多音节，台诸语为单音节；普标语和拉哈语保留着辅音丛，台诸语没有辅音丛)。普标语、拉哈语和南岛语共有的词汇中存在许多数词。普标语、拉哈语和汉语共有的词汇多半借自中古汉语或现代汉语。

所有的加岱语均无文字。使用加岱语的人通常会说多种语言。母语主要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领域，在社会场合主要使用越南语、泰语(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普标族)或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仡佬族)。

加岱语研究相对而言起步较晚。最早提到普标语的是黎贵同的书(1773)。越南民族志学家邓严万和阮竹平的著作出版后拉哈语方为人知。1979年和1981年曾由苏-越考察队联合对拉哈语和普标语开展调查。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撰写了两部书，书中对这两种语言进行了描写，还附有语法和词汇问卷材料以及民俗材料。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贺嘉善研究仡佬语的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亦收有其相关条目。

Яхонтов С. Е., В защиту аустро-тайской гипотезы, в кн.: Ностратические языки и ностратиче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М., 1977 (лит.).

Материалы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79 г. Язык лаха, М., 1986.

Материалы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81 г. Язык пупео (в печати).

Benedict P. K.,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2, v. 44 (лит.).

Ле Куй Дон, Заметки об увиденном и услышанном, Ханой, 1962 (на вьетнам. яз.).

Данг Нгием Ван, Нгуен Чук Бинь, Этнические группы носителей семи австроазиатских языков, Ханой, 1972 (на вьетнам. языке).

Хэ Цзяшань,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языка гэлао, Пекин, 1983 (на кит. яз.).

Ван Буши, Язык гэлао, в кн.: Кита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Пекин — Шанхай, 1986, с. 131 (на кит. яз.).

(田文琪、张家骅 审校)

## 语言单源论 (Моногенеза теория)

(作者: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译者: 王辛夷, 北京大学)

关于人类语言来自同一起源的学说。语言单源论的前科学形式可认为是各种神话和宗教的观念,根据这些观念,人类在存在之初只有一种语言。体现这种神话观念的最早形式可以认为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关于神话时代的故事,那个时代“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用同一语言(eme-as-əm)一起为恩利勒神唱圣歌”,后来这也反映在圣经旧约因建造巴比伦塔而搅乱语言的故事和古希腊俄狄浦斯破解谜语的故事中(根据谜语内容,人类“只有一个语言——嗓音”)。和圣经传说相联系的是欧洲学术界到17世纪一直流行的关于古犹太语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古犹太语是最古老的语言,许多语言很可能都源于此。到18-19世纪,语言学一度抛弃语言单源论,前科学的各种语言单源论形式让位给各个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但在语言学历史的这一阶段,由于每个语系的历史研究尚不充分,语系之间的联系通常(排除不多例外,它们对这个时代不具代表性)未曾加以审视。

新的时期开启于20世纪初,当时在综合各个语系研究成果的方面作了一些初期尝试。A. 特龙贝蒂不仅首次实现了把早前勾勒出的语系联合为更大的组群(晚些时候这样的组群被称为超语系),而且认为这些组群之间可能存在着词汇联系,按照特龙贝蒂的意见,这证明语言单源论是正确的。但是特龙贝蒂并未足够明确地将确定超语系和语言单源论区分开来。

语言单源论的另一形式是由 Н.Я. 马尔提出来的,他在后期的著作中推论,原始人的语言中有4个成分(SAL, BER, YON, ROS),并试图把现有各种语言的所有词都归结到这四个成分(或者常常是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变体)上来。虽然20-30年代有很多“新语言学说”的代表人物追随这一理论,但后来马尔的学生背弃了它,因为无论是该假说,还是其他一些

假设原始语有若干初始词的类似方案（排除与历史比较语言学成果相关的方案），都无法用科学手段来证明。

20世纪60年代，M.斯瓦迪士提出了很接近特龙贝蒂思想的语言单源论方案，但这个方案顾及到经典历史比较法对每个语系和超语系的研究结果。在把新大陆和旧大陆的语系进行对比时，斯瓦迪士认为可能存在把这些语系联合起来的超语系，甚至超语系之间也可能存在联系，从而支持了语言单源论。作为**语言年代学**的创建者，斯瓦迪士还指出，在科学论证语言单源论的道路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困难。用语言年代学方法对现代诸语言和基于这些语言建构的诸语系进行对比研究，这无助于深入到远远超过万年的古代。但有一点尚不清楚的是，新石器革命前（约公元前一万年）日常词汇的变化速度是否同革命带来的变化速度同样快。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十分久远时代的语言对比研究仍然是可能的。

语言单源论的现代状况与现代人单源问题紧密相关。按照最流行的观点，有声自然语言是现代人的特征（也许，这是现代人有别于其先祖的主要特征之一，参见**语言的起源、语言发生**）。如果（很多人类学家都这样认为）人（现代人）由于单一突变而出现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大概约十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约三万年前为数不多的群体由非洲向欧亚大陆西部扩散），即现代人是单源发生的，那么语言单源也是可能的。作为个别突变的结果，第一个体与由他（也许是他与人的一种先辈代表杂交的结果）生育的其他个体用具有适应优势的一种语言进行沟通，这一语言使得第一个现代人以及他的后代们开始在选择中胜出。掌握语言不可或缺的诸多特征的生物遗传（以发达的咽腔为前提条件的发音器官构造、左半球言语区域的发展，特别是保障复杂的句法结构构成的额叶部分的发展、右半球语义区域的发展）此后应一直伴随着每一代人掌握语言的过程。如果说种族是智人分化的结果，那么种族的主要差别可以和那些原始语言的早期方言相比较，这些方言后来发展成为基本超语系的原始语。根据种族形成观点的一个选项，每一个种族都是人的各种先辈之一与第一个智人代表的后裔杂交的结果。由此也可以推测，这一人类学进程与原始语分化为方言以及后来方言各自独立的过程之间存在联系（但是更复杂的，间接的联系）是可能的。虽然这个人类学图景使语言单源论变得可能，但不能认为它是单源论的依据。

证明全部那些假设的、产生出各种语系的超语系有一个囊括所有**世界语言**的共同起源，这将是语言单源论的唯一科学依据。只是在不久之前，由历史比较语言学揭示出来的语系才开始被结合成类似诺斯特拉诸语言的超语系（参见**诺斯特拉诸语言**），而且有些超语系原始语的构拟程度还不足以令人满意。既然像诺斯特拉和假设的北高加索 - 叶尼塞 - 汉藏 - 北美印第安这样的超语系的存在时间在公元前一万年至两万年之间，在确立它们之间合乎规律的关系时，可寄希望于构拟时间与现代人出现在西欧亚大陆接近的原始语（这些超语系与南非的科伊桑超语系的相互关系问题尚未解决；也许它们彼此分离的时间十分遥远）。除了斯瓦迪士指出的语言年代学的局限以外，在厘清这些关系道路上的困难之一是，很有可能把许多后来才进入日常词汇中的词当成古代的文化用语。比如，属于诺斯特拉诸语的印欧诸语的

**\*Hnomn** ‘名’、乌拉尔诸语的**\*nime**、古尤卡吉尔语的**nim**（名），苏美尔语的**inim** ‘词’、藏语的**min** ‘名’（属于汉藏诸语）全部源于一个共同用语，这个用语能够反映关于名字义值的古代神话观念，并且随着这一观念的扩散而在欧亚大陆传播。

总体来说，语言单源论与重大发明的唯一性思想相联系，这一发明对于第一个现代人来说可能就是他的语言。但很多后人可以做出自己的发明，这些发明涉及各别的词和它们的概念。各别的神话方面或者技术方面的发明以及表示这些发明的用语的扩散，能够反映相应用语的唯一性。所以，如印欧诸语和科伊桑（布须曼 - 霍屯督）诸语中表示“船”的用语相同，与其说是历史的残迹，不如解释为扩散的结果。但是，即使排除这些用语，现在也已经可以指出，在基本的超语系的构拟原始语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相同的地方（如人称的语法和

/ 或者代词表达手段)，这是对语言单源论有利的证明。语言单源论的反对者把部分的情况解释为由于存在可能使用相似音位组合表示相同概念的语音象征(звучовой символизм, sound symbolism)的缘故，但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语音象征机制和世界所有语言的单一来源是否有联系(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存在于一些语言普遍现象中)。

有一种思想认为，人种形成、人的初始形成有若干不同的中心，这个思想为一些人类学家所接受，反对语言单源论的观点与这种思想相关。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完全排除在智人历史的某一早期阶段，一种语言排挤掉所有其他语言而胜出的可能性(如果不同人种群体代表继续相互沟通的话)。这方面很典型的是，蒙古人种常常被假定地与中国猿人后裔加以比较，这个人种代表使用的语言属于诺斯特拉超语系、汉藏超语系，它们的原始语却局限在西欧亚大陆(或中欧亚大陆)，但不是东欧亚大陆，也就是说，这里的人类学和语言学发展线明显地不相互对应。所以，即使要为反语言单源论的观点寻找论据，也只能着眼语言的方面，于是要证明的就应该是，超语系之间完全没有什么远古联系，尽管它们之间并不局限于个别用语的扩散。而在这种情况下却可以援引语言年代学来反证，按照语言年代学的观点，这样的远古联系也许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语言的进化所湮灭。因而，令人困惑的是，证明这个反对语言单源论的观点反而比证明语言单源论本身还要困难。现如今，语言单源论正确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Алексеев В. П., Очаги рас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и история, «Природа», 1973, № 5.

Его же, Географ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рас, М., 1974.

Иванов В. В., Об одной древневосточной параллели к загадке Сфинкса—Эдипа, в кн.: Структура текста-81. Тезисы симпозиума, М., 1981.

Trombetti A., Elementi di glottologia, pt 1—2, Bologna, 1922—1923.

Rosenkranz B., Der Ursprung der Sprache. Ein linguistisch-anthropologischer Versuch, 2 Aufl., Hdlb., 1971.

Language origins, ed. by R. W. Wescott, Silver Spring (Maryland), 1974.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speech, N. Y., 1976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 280).

Décsy G., Sprachherkunftsforschung, Bd 1, Wiesbaden, 1977.

Glossogenetic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languages, P., 1983.

(田文琪、张家骅 审校)

## 语言系统 (система языковая)

(作者: Т. В. Булыгина, С. А. Крылов; 译者: 李洪儒, 黑龙江大学)

任何自然语言处于相互关系和联系中的语言成分集合,这种集合形成特定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语言系统的每一个要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该系统的其他一些要素处于对立关系之中。因此,语言系统要素的研究一般从它在该系统中的作用,也就是从它的**价值**(功能相关性)出发。比如,没有双数的俄语中的复数,较之保留双数的斯拉夫语中的复数,具有不同的价值。

现代语言系统观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语言层级、语言单位、聚合关系(参见**聚合体**)与组合关系(参见**组合体**)、语言符号性(参见**语言符号**)、形式(参见语言学的**形式**)与功能(参见**语言功能**)、结构与实体、语言中的外部联系与内部联系、共时与历时、分析与综合、规律性与非规律性等。

术语“语言系统”或用于具体(局部)意义,表示同层级的同类语言成分有规律组织起来的总和,它们通过稳定(常体)关系相互联系(“格系统”、“音位系统”等),或用于概括(总体)意义,表示诸局部系统(“亚系统”)有规律组织起来的总和。系统性概念有级次差异,也就是说,它允许各种不同级次的系统存在。同类语言事实构成的集合拥有局部意义上的系统性,如果该集合描写得既穷尽又不冗余,描写的形式工具(一套有相应特征和关系的基本客体以及由简单客体构成复杂客体的规则)比凭借经验开列的初始事实清单更加简单、经济。在组织得好(结构严禁)的系统(例如,与词汇学不同的音位学)中,一个因素的重要变化可能导致系统其他点发生变化甚至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语言系统的非绝对性,各部

分系统性程度的不同，形式与内容不对称（参见**不对称性**）的大量存在，语言保守（稳定）倾向与其诸多进化因素（诸如力求经济、类推和规范化）的角力，所有这些都导致语言系统各种亚系统的发展速度不同。因此，无论语言的整个系统抑或各亚系统，都可以区分出核心与边缘、强势特征与弱势特征。

与动物的交际手段不同，语言系统的特点是能够表达思维的逻辑形式（概念和超越时间判断），可以脱离情景和言语行为参与者，客观地报道世界。与人工形式化符号系统不同，语言系统以出现和发展的自发性为特点，可以表示直指（дейксис, deixis）的、富于表现力的和祈使的信息。语言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放性，与人的认知活动环境相互作用（智慧圈），这使得研究语言系统的“外部”联系很有必要。

古希腊、罗马语法学家关于类推和异常关系的争论、唯理论者以逻辑规律的作用来解释语言事实多样性的努力、G.W.F.黑格尔和 W.V.洪堡特对语言辩证本质的揭示、A.施莱赫尔的语言“生物”观或者青年语法学派的语言“心理、物理机制”观以及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对（类比结构中）语音规律与“系统约束”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所有这些都超前于 20 世纪语言学家（Ф.Ф.福尔图纳多夫、И.А.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O.H.叶斯泊森、C.巴利、特别是 F.D.索绪尔）对语言的系统理解。语言研究系统方法的形成和进化以 20 世纪科学的普遍转向为背景：从“原子”观转向“整体”观（即承认整体比部分重要，现象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参见语言学的**方法论**）。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下述理念在语言系统学说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系在语言中的作用，区分语言的静态与动态、外部历史与内部历史，分离出诸如音位、语素（位）、字位、语段（位）这些语言系统最普遍的单位类型。在索绪尔的学说中，语言系统作为符号系统（参见**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理论**）予以研究，应该区分内部语言学研究的符号系统内部结构与外部语言学研究的符号系统外部功能。语言系统以言语活动的所有具体体现为基础，不能让我们直接观察到，仅仅在**言语**中被现实化。言语因而乃是语言学家用来作为基础构拟语言系统模型（系统模型即理论建构，人们也常常称之为“语言系统”，它们在比较、评价同一语言系统相互角力的若干模型选项的适切性时需要关注）的初始材料。继索绪尔之后，许多研究者都把术语“语言系统”用作术语“语言”的同义词，以再次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事实；当语言（或者语言系统）作为某种具有抽象、潜在、可能、蕴涵、常时、关系等特点的实体，与言语对立时，上述替换性使用尤其常见。E.科塞留提出对系统的一种比较狭义的理解：系统不仅与言语（“习惯用法”）对立，而且与公认（传统）的使系统现实化的规范对立。尽管索绪尔在自己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实践中作出了历时系统法的一些范例（参见**喉音理论**），但是他依然在理论上坚持，语言系统本身仅仅现实地存在于共时之中。根据索绪尔的理解，语言系统的“基础是同一性和差异性”（其中差异居统领地位）；确定语言系统中任何成分的性质不是通过该成分的“本体”特征，而是通过它的“关系”特征，亦即其义值，该成分对其他成分在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实现。

语言的系统组织思想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几个流派中获得了发展，结构主义语言学将盘点（分出和分类）抽象程度越来越大的语言单位以及确定语言单位之间最普遍的关系类型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比如，**语符学**从语言系统“内在”的、非本体的视角出发，作了确定语言系统的所有基本单位和基本关系的尝试（关于这种研究路径的局限性，语符学的批评者已经多次指出）。

**布拉格语言学派**不接受索绪尔关于历时的非系统性说法，依然从系统原则的角度出发看待语言的进化。P.O.雅可布逊、B.特尔恩卡、J.瓦赫克以及 C.O.卡拉采夫斯基、E.Д.波利瓦诺夫（后来还有 A.马丁内、科塞留等）的著述研究语言系统各种发展趋势的辩证矛盾。这些发展趋势的作用虽然在于努力实现系统的“平衡”（对称，填补系统内部的空白），但却从来不允许系统达到绝对稳定：在排除旧的“热点”的同时，发展趋势在语言系统中会产生

新的“热点”，进而引起语言中新的不对称出现。因此，即便在共时方面，语言系统也不是静止的系统，而是动态（多变、发展）的系统。在布拉格语言学派学者的著述中，语言系统是一个功能系统，即一个由服务于某种特定目的的各种表达手段构成的系统。语言功能概念为语言系统在高一层级系统（人的社会生活）中找到了位置，而语言成分的功能概念则有助于发现该成分在语言系统内部的作用和它与同一语言系统其他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布拉格功能主义者的主张——语言是“系统的系统”（类似观点是现代控制论中的语言是复杂系统）也获得两种解释：1) 语言系统是一个语言层级系统，其中的每个层级也是一个系统；2) 语言系统是其各种功能、修辞变体（参见语体）构成的系统，其中每个变体同样是一个系统。

在语言系统学说的构建中，以福尔图纳多夫、博杜恩·德·库尔特内、A.M.佩什科夫斯基传统为基础、关注世界语言学杰出成就的俄罗斯本土语言学有重要的地位。大部分苏联研究者同意语言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符号系统，承认区分语言系统研究的共时方面与历时方面、语言系统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语言与言语、语言单位的区别特征与非区别特征是正确，但他们拒绝极端结构主义的片面结论，强调语言系统的非刚性、不对称性，不同部分系统性的程度不同（B.B.维诺格拉多夫、B.Г.加克、B.H.亚尔采娃等），揭示语言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不同既体现在关系上，又体现在本体上（B.B.伊万诺夫、T.B.布雷金娜等）。学者指出，脱离本体特点仅仅考察语言系统的关系并不充分，有必要将关系特点与本体特点结合起来。有时这种综合研究方法被称作“系统法”，即纯粹关系的方法，以与“结构法”对立。他们研究语言系统“发展的二律背反”（M.B.巴诺夫）、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波利瓦诺夫、B.M.日尔蒙斯基、Б.А.谢列布林尼科夫等）、语言系统在社会中行使功能的规律性（Г.В.斯捷潘诺夫、А.Д.什维伊采尔、Б.А.乌斯宾斯基等）、语言系统与大脑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Л.С.维果茨基、А.Р.卢里亚、Н.И.仁金、B.B.伊万诺夫）。

尽管许多研究者都把“系统”和“结构”作为同义术语使用，业已出现区分二者的趋势，但是能够得到学术界公认的区别尚不存在。对此，哲学和语言学文献中流行的理解是，系统是特定结构与特定本体的整合搭配，该搭配行使某种功能；而结构则是系统的关系框架、系统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网（Г.И.梅利尼科夫、E.C.库布里亚科娃）。有时系统被界定为由对立关系联系起来的同一层级单位的总和，而结构被界定为表示意义对立关系的语言手段的总和，由内容层面与词语层面、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确定（H.Д.阿鲁秋诺娃）。J.R.弗斯奠基的**伦敦学派**所持的主张是，结构成分（“篇章的组成部分”，它们构成或整合为结构）通过组合关系相互联系，而系统成分（“类别的成员”，它们表征或实现系统）则通过聚合关系相互联系。两个术语的这种理解如同相应词的惯常用法十分一致：关于结构常说词的结构、词素结构、词干结构、语段结构、句子结构、语篇结构等，但关于系统却常说元音系统、一个词的形式系统、格系统、音位系统、多义词意义系统等。A.A.列佛尔马茨基多把相近的内容纳入术语“结构”和“系统”（虽然他把“结构”更多地理解为针对语言结构而言的总括义）。试比较L.耶尔姆斯列夫的“篇章”/“系统”、“链条”/“聚合体”等类似的术语对立以及其他对立术语。从这种角度着眼，系统关系与聚合关系同义。就这个意义而言，美国**描写语言学**虽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组合关系（特别是搭配关系，参见**分布分析**）研究上，但研究的与其说是语言系统，不如说是语言结构。与此相反，建立对立理论的H. C.特鲁别茨柯伊和其他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对语言系统作上述意义的研究。关于对立关系在语言系统中的主导作用，此前索绪尔、博杜恩·德·库尔特内、H. B. 克鲁舍夫斯基、福尔图纳多夫就已经强调指出过（尽管用的是另外一些术语）。

将成分分析法（即分出区别特征的方法）从音位学引入语义学（既包括词汇语义学，又包括语法语义学）和建立语义场理论，二者对于理解各种不同语言领域的系统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随着“句法聚合体”、释义改写和派生等理论以及转换方法的广泛运用，系统方法在句法学中也得到完美的体现。

如果在 20 世纪 30 - 40 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各经典流派中, 语言系统被理解为语言单位及其关系构成的系统, 那么 20 世纪 50 - 70 年代的语言控制论模型中, 语言系统则更多地理解为语言单位构成、转换和组合的规则系统。于是, 无论各种生成语法 (包括转换语法), 还是经常用于**机器翻译**系统的各种“变换”语法 (分析与综合模型), 都陆续地建构起来。在后一种情况下, 语言系统作为运行 (“动态”) 机制参与, 实现从词语实体 (篇章) 向内容实体 (意思) 过渡; 反向过渡时, 则通过一系列中间层级或 “层次” 实现。比如, S.兰姆的层次语法、P.斯加尔的功能 - 生成语法、“意思 - 文本” 模型等。下述主张得到了证实: 只有将语义学与名称学、“消极” 语法与 “积极” 语法 (Л.В.谢尔巴尔)、“说话人语法” 与 “听话人语法” (叶斯泊森和稍后的雅可布逊、Ch. 霍凯特) 结合起来, 才能正确理解语言系统。这符合**符号学**对语言系统的理解。符号学认为, 语言系统是一种代码——对报道进行编码、解码的手段。沿着 “从思想到思想表达手段” 的路径描写语言系统, 这是 20 世纪初 F. 布吕诺着手进行的。在现代语言学中, 上述两方面的结合为更好地揭示语言系统中词汇和语法的相互作用以及语言系统各层级的依存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在现代**类型学**中 (雅可布逊、J.H.格林伯格、谢列布林尼科夫、乌斯宾斯基), 要达到语言系统多维特点研究的目的, 须引入日趋复杂的、广泛展示语言系统 “特征空间” 的多维分类法, 揭示隐性共相, 即各种不同特征意义之间的依存关系 (如若语言系统中有形容词性的区别, 那么其中就应有名词的词法性与其对立), 确定这些特征与被它们接受为语言意义的相对权重以及对于结果的数量评价。这一切不仅使我们可以判断各种语言系统的属性, 而且可以判断人的语言整体而言是一个系统。

- Петерсон М. Н., Система языка,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ОЛЯ, 1946, т. 5, в. 2.  
 Балли Ш.,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55.  
 Ельмслев Л., Прологомены к теории языка, [пер. с англ.], в кн.: Новое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 1, М., 1960.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как теор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языковы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и её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приложения, в сб.: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машинному переводу, в. 2, М., 1961.  
 Его же, Маши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й между языковы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в сб.: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точной механики и вычислительной техники АН СССР, в. 2, М., 1961.  
 Уфимцева А. А., Опыт изучения лексики как системы, М., 1962.  
 Гухман М. М., Понятие системы языка в синхронии и диахрони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62, № 4.  
 Косериу Э., Синхрония, диахрония и история, в кн.: Новое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 3, М., 1963.  
 Апресян Ю. Д., Идеи и метод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М., 1966.  
 его же,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языка, М., 1974.  
 Материалы к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Язык как зна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особого рода», М., 1967.  
 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Б. А., Об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системы языка, М., 1968.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 А., Термин как член лекс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языка, в сб.: Проблемы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1967, М., 1968.  
 Ярцева В. Н.,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и лексики в системе языка, в к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грамматики. М., 1968.  
 Успенский Б. А., Отношения подсистем в языке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ими универсали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68, № 6.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А., Всегда ли система системна?, в сб.: Система и уровни языка, М., 1969.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Формы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функции, история языка, М., 1970.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Внутр. структура языка, М., 1972.  
 Щерба Л. В., 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и 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 1974.  
 Слюсарева Н. А., Теория Ф. де Соссюра в све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М., 1975.  
 [Степанов Г. В.], Внешняя система языка и типы её связи с внутренне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в кн.: Принципы описания языков мира, М., 1976.  
 Соссюр Ф. д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77.  
 Лэм С., Очерк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он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пер. с англ., Минск, 1977.  
 Солнцев В. М., Язык как системно-структур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 изд., М., 1977.  
 Вардоль И. Ф., Основы описатель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синтаксис и супрасинтаксис), М., 1977.  
 Будагов Р. А., Система и антисистема в науке о языке,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78, № 4.  
 Мельников Г. П., Системология и языковые аспекты кибернетики, М., 1978.  
 Гак В. Г., Предме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в кн.: Бородина М. А., Гак В. Г., К типологии и методике истор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Л., 1979.  
 Якобсон Р. О.,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М., 1985.  
 Guillaume G., La langue est-elle ou n'est elle pas un systèm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1, Qu'èc, 1952.

- Coseriu E., Sistema, norma y habla, Montevideo, 1952.
- Vachek J.,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een as a system of systems, в кн.: Sborn k prac í filozofické fakulty Brněnské univerzity, Brno, 1958.
- Zeichen und System der Sprache, Bd 1—3, B., 1961—66.
- Sgall P., Zur Frage der Ebenen im Sprachsystem, «Travaux linguistique de Prague», 1964, № 1.
- Berry M.,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linguistics, v. 1 — Structures and systems, L. — Sydney, 1975.
- Krupa V., The category of system in linguistics, «Recueil linguistique de Bratislava», 1978, v. 5.
- (张家骅、许高渝 审校)